

# 斗争

斗争月刊编委会

# 卷首语

风穿过房间，窗帘被冬风拉扯地猎猎作响，平日里人满为患的房间此刻终于冷却下来。平日里和我同吃同住的同志们都有序的进入了工厂，只剩下空荡荡的椅子和不常用的个人用品，表明着曾经有人在此生活。

我将顶灯关闭，只留下台灯微弱的灯光照亮着四壁，光影交错间，房间显得更加幽深。将窗帘轻轻拉上，试图遏制寒冷的入侵，却无法挡住风儿的嘶鸣。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寂寥，我知道温暖的集体氛围不是消失了，而是随大部队去到了工厂。

为了驱散不断增长的烦躁，我下楼走向自动售货机。

翻看手机，同志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住宿条件，用工环境，我却一点都插不上话。不禁开始思考，革命者无法仅仅依赖于读书、看报、浏览新闻（即理论学习）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集体生活才能有效的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立场，才能让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忧郁、软弱、迷茫得到解决。暂时离开集体生活给我带来的感受就能很好的说明这点。

“人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构建自我”，在无产阶级的实践、共同生活中，才能有效的构建属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和先进的革命者的共同实践中，构建最先进的革命觉悟。

离开集体生活半个月、奔波于各地出差的我，感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蠢蠢欲动，它想要在我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中反扑属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偶尔会产生一些极其卑劣的幻想，意识到这一点后让我感到胃里翻江倒海。这再次体现了没有同志之间密切联系的网络组织、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子化个人，难以成功改造个人的小资性、小资产阶级幻想，这也是为什么网络组织群众工作的方式总是“筛选”，而非“培养”，如果要走向培养，就必须走向更密切的线下联系。

“积极的在集体生活中改造自我”，越感受集体生活，越能够意识到这句话的含金量。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中，在小资产阶级的共同生活中，在原子化的没有理论指导的一般群众生活中，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集体学习，是难以革除旧社会在自己身上的深深的烙印的。

我愈加期待年后和同志们的再次见面。

# 目录

- 1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纲领
- 13  
《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巴库倡议）
- 20  
韶山纪念活动对我国革命的意义
- 28  
性产业的走访调查（一）——站街篇
- 32  
群众路线的起源和发展
- 40  
我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什么工作？
- 47  
谣言破除——列宁因为梅毒去世
- 50  
宁陵县的斗争
- 57  
一篇文章看懂儒法斗争的历史
- 63  
反对进厂、恐惧斗争——评《新十月》的机会主义路线
- 71  
用“到工人中去”融工范式分析新十月融工故事
- 77  
民主皇帝（小说）——读者投稿

#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纲领

★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

## 总的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绝不是一场浩劫，相反它的失败才是。此后全世界人民彻底失去了所有社会主义政权，国际范围内的红色热潮就此退却，资本主义也从六七十年代的危机中走了出来，而亿万自由的劳动人民，无数的革命战士则失去了一切，仅仅只在印度、菲律宾、土耳其和某些国家的山林中保留了一丝希望的火种。

在中国，党内资产阶级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演变成了独立于国际资本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他们为了在革命的尸体上建立起了令希特勒都自愧不如的法西斯专政，为了复活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就以最残暴的方式摧毁了曾属于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和绝大部分群众组织。

紧接着又凭借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庞大工业遗产、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通过所谓“改革开放”迅速在中国重新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中国并未在此过程中像越南、古巴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一样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半殖民地；相反，资本主义在中国，从复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和独立性，这使得中国必然会演变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目前它已经演变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是今天世界上唯一一个有野心还有能力同美帝国主义争霸的帝国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大生产。但中国和一般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那样产业空心化的国家不同。今天的中国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工业产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与之相伴的是，今天的中国还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并且是一支文化水平较高的队伍。

然而可悲的是。在目前这种生产方式和统治秩序之下，最重要的和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商品流通手段和全部的政治权力尽归一个人数极少极少的阶级，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独享；而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中国劳动人民，则由于自己可悲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得不一声不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生；他们早就由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人，沦落为了任人摆布的雇佣奴隶。加上社会生产力在近几年来众多革命性的突破，垄断资本在疯狂积累剩余价值的同时（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目的就是永远不断地和尽可能多地积累剩余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就是一种盲目的、反人类的存在），也必然会使大量的非垄断资本家和小生产者破产，并使其残存下来的那部分进一步被边缘化，进一步依附于垄断资本。同样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对于工人活劳动的需求大大降低，劳动力商品现已严重过剩，剩余劳动力大军的规模，现已十分庞大，并且还在继续扩大之中。这就必然导致我们的劳动人民陷于严重内卷的困境之中，这就必然导致一部分劳动者过劳至死，而另一部分却无以谋生。到头来除了垄断资本，所有人累死累活却尽是一无所获。一句话：现状就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人民内卷，资本得利。”这就必然会引发一个矛盾，一个对抗性的、不容调和的矛盾，即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这便是如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事关接下来几十年整个人类文明的命运。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矛盾，就必须发动群众灭亡资本主义的中国，重建社会主义的中国。为此，我们必须要把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消灭目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解决今天中国基本矛盾的唯一手段是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上一次是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结束的）

有人说我们共产主义者拒绝用和平渐进的手段来促进社会进步，而热衷于暴力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阻碍社会和平进步的人从来就不是我们，而是统治阶级。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绝不是痴迷于血腥暴力的恐怖主义极端分子，假如我们能用和平手段达到同样的结果，我们又何苦流血牺牲呢？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法用和平手段彻底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因为统治阶级是一定要用刺刀来维护自身的统治的，并且正在用刺刀维护自身的统治！（中国统治阶级的法西斯暴政甚至无法容忍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组织的存在，哪怕是那些对现有秩序完全无害的、纯粹改良主义的公益组织也无法容忍）

此外，我们一百七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经验表明，从社会党国际的一众叛徒到本世纪尼泊尔革命的叛徒，凡是主张用不触及统治阶级核心利益的方式来改变社会性质的个人或组织，最终要么就是直接灭亡了，要么就是蜕变成了披着红皮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而我们绝不要步其后尘！**因此我们认为，唯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列宁的手段才能实现我们的目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真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天中国的革命者应该重上井冈山，重新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上世纪，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前辈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探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适用于一切落后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仅适用于拥有大量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余的国家，而并不适用于一切半殖民地国家）通过这条革命路线，革命群众将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逐步夺取全国政权，从而在帝国主义时代，人为地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这种国家的发展前景并非是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是通过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从而和平合法的（新民主主义的法律）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仍需要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坚决斗争！）即马克思所说的“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因为在这种国家，由于人民已经事先掌握了政权，所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被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了。今天印共（毛）和菲共的同志就正在进行这样的革命斗争。

这种无产阶级及其盟友通过人民战争取得政权，并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之所以适用，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相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较弱。并且几乎所有的这类国家都未曾实现工业化（事实上它们也不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下实现工业化），所以其中央政府的权力往往难以抵达至地方。加上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在这类国家中也存在矛盾，难以协调。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往往会存在政治空隙，而革命党就可借机展开活动。又因为在这类国家中，群众往往以农民（特别是近似于前资本主义的小农）为主，整个社会中充斥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因此，只有通过深刻的持久人民战争，在运动中席卷整个社会的持久人民战争，才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灌输到人民群众当中。

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甚至包括工业化的半殖民地国家，例如韩国和乌克兰），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工业强国中，持久人民战争理论显然并不适用。那些强行将仅适用于落后国家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普世理论的贡派，则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他们没有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面对统治阶级更加强大，政治缝隙几乎不存在，并且各地经济联系十分紧密的情况，**我们必须采取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即十月革命的路线来解决今天中国革命的问题。**

要贯彻这条路线，首先需要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深入到群众的各个阶层去（当然，首先是到工人阶级中去，他们永远是我们的基本盘），去宣传、去组织、去学习、去教育。一句话：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

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里所说的三个过程缺一不可，每一步都值得好好分析。

（一）“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绝不是说我们要盲目的收集群众中持有者最多的观点，例如今天的群众大部分支持特色党的民族主义，这我们就绝不能盲从，否则我们就成了最坏的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同样，这种群众意见的集中工作也绝不是说我们要特意找寻那些我们想要听到的意见，那些符合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意见。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掘出那些被现实的阶级斗争实践所证实了的，符合无产阶级长远利益的意见。

（二）我们收集到了群众的意见就应该将其加以系统化处理。经过我们处理的意见应该是能最大化覆盖到群众当下直接需求的意见，并且还是包含着或是导向着“推翻统治阶级”，这一现阶段终极目的意见，而不再是简单的，零碎的观点。同时，这种加工后的意见也不应该过度的学理化，以至于群众难以理解和运用。

（三）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我们完成了对群众意见的收集和系统化工作后，我们的宣传家和鼓动员就有义务将处理后的观点推广到群众中去，使其变成群众自己的观点，并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加以检验这些观点。假如我们贯彻这样的领导方式和组织方式那么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的时候，在群众斗志昂扬，运动发展一帆风顺的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适当拔高，适当地加入一些跳起来摸得着的要求。但总体而言，我们不应该脱离当前实际，过早地提出某些远超当前阶段的要求和意见，这会使得群众离开我们，并使本来能够争取到的利益都变为泡影。有时候，群众由于长期浸泡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海洋里的缘故，不可避免的会固守某些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这时候我们提出相左意见可能会不讨人喜欢（但还是要提的）。但我们也决不能急于求成，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意愿来代替群众的行动。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要我们放弃原则，屈从于群众自发的趋向和一时的观点，堕落为民粹主义者，而是要我们耐心等待，慢慢说服，让群众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到问题所在，逐渐认识到孰是孰非。毛主席对此总结到：“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

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在目前中国这样工作时长动辄 14 个小时，政治监察异常严格的地方，个人单打独斗去融工显然是不行的，或者说至少是“投资和收益不成正比的”。假如我们不想做无用功，就必须首先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然后才能事半功倍地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进一步的工作。考虑到目前我们中国马列毛主义者主要以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大学生为主。那么在现阶段，我们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各个高校里将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初步的学生组织。我们知道，学生本身是脆弱的（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学生组织自然也不可能作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基础。但在现阶段，如上所述，我们需要最大化地利用现有人力资源，不浪费每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我们需要尽可能地用学生工作作为火柴，来点燃我们工人工作的火把。具体地讲，当我们在某地的学生工作达到一定规模时，我们就可以，而且是应该尽可能地派人联系工人群众。当然了，在我们准备足够充分，力量足够强大的地方，也可以直接与工人群众建立联系，这条道路以及被一些同志加以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上述的这种联系在一开始无疑是最基础的接触，我们绝不应该幻想能通过简单的口头语言交流就将一位深陷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海洋中的工人一下子变成台尔曼。就像物理科普工作者不应该见人就讲相对论一样，我们也不应该一开始就对群众（包括学生）讲极为深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不应该上来就讲什么“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样除了把人劝退以外别无他用。事实上，我们应该从最基础的交流开始，真诚地把工人当做我们的朋友来对待，而不是等待着被老师上课的无知学生。我们应该了解他们的生活，知晓他们苦难，从最日常的，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细节中逐渐引导群众。当我们同群众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在日常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现阶段，无疑是经济斗争）把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从而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永远要明晰一点，群众往往是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的，不认为自己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而一旦群众在我们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哪怕最终并

没有获得多少物质报酬，但也能大大增加群众的信心和组织度，并且只要有了第一次斗争，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这样的斗争都会成倍地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要知道，群众假若跟着我们走，绝不是因为我们是马列毛主义者或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为他们张目，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行动，由此他们才认可我们是其利益的代言人，才愿意听我们说话（灌输阶级意识就要特别重视这个环节），才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因此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考虑到多数群众能否接受，是否符合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当前需求。

但目前我们的工作极其不足，以至我们的各种组织宣传工作根本满足不了当下各种群众运动的需求，以至于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在行动上远远落后于人民群众，以至于各种群众斗争风起云涌时，我们却集体“失踪”了。我们有义务尽快尽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假如我们能够贯彻上文谈到的这种马列毛式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帮助尽可能多的群众和我们自己在复杂的现实阶级斗争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增强自己的信心，积累自己的经验，锻造自己的组织，培养自己的干部。而这一切都是为促进和赢得最终的阶级决战做准备。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再也无法照旧持续下去时，当人民也无法照旧度日时，当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到政治活动中时。我们在无数的日常阶级斗争实践中所积累的一切，都将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我们长期工作和无数日常斗争实践锻造出来的一支自觉的无产阶级队伍，能够在革命危机的风暴到来之际，通过高度组织的城市起义和武装总罢工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狭义的讲，就最终决战而言，工业国的革命可以约等于为全国武装总罢工）而俄国革命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即使是在一百年前沙俄那样一个极为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都能通过这条路线夺取政权，那么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第一工业国的革命者，又有什么借口不能帮助工人们重铸列宁的事业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仅适用于那些仍需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家，但如上所述，暴力革命的原则，即“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则却是普世的。因此这就涉及到我们的“枪杆子”究竟从哪里来的问题了。

恩格斯在写给法国工人的文章中专门提到了这点，他说到“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这里二十五岁才能成为选民，而二十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

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虽然官僚饕餮暴政下的当代中国甚至连当年德皇治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都完全不具备，但恩格斯这段论述的底层逻辑却依旧适用于一切工业国。不用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军队从来都是国家机器的核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机器的核心则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最为纯粹的暴力机器，是极为反动的存在。然而如此反人民的组织却又不得不由劳动人民来组成，这无疑又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而资产阶级是绝不可能消除这对矛盾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军队的主要成分绝不可能由统治阶级构成，因此统治阶级无法消除军队是由人民组成的事实。此外，由资产阶级掌控的军队，和其他暴力机器一样，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是要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所以军队的存在目的本身，就绝不可能符合被统治者（即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任何指望资产阶级会主动放弃维护自身统治的暴力机器的人，非蠢即坏，或者两者兼具。然而任何矛盾，但凡其存在，就必然是要得以解决的。既然资本的代表无法解决军队存在的目的和其成分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人民的代表就应该去解决它，以实现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如上所述，我们早晚要把我们的人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而那些受到了马列毛主义影响的群众中肯定会多少有人进入到军队当中去，我们也早晚要把我们的人同样派到军队当中去做群众工作，这就必然会使反人民的军队“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而当这种传染逐渐加深，上述矛盾也必然会愈发尖锐。并且军队毕竟是一个社会组织，那么社会上的矛盾也就必然会多少影响到军队内部；那么当席卷全社会的革命危机到来之际，当“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的迅速增加”时，军队内部也必然会发生动摇和分裂。而到了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士兵会倒向革命人民的一方，就要看我们平日里做的各种工作（当然也包括军队中的工作）究竟成效如何了。

在上个世纪，我们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红遍了大半个世界，然而这一切却最终被各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给全部破坏了。据此可知，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威胁主要是革命组织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我们必须明晰一点：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组织，包括革命党都必然或多或少的会反映整个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实际。因此任何试图构建一个彻底纯粹的组织的人，都是十足的幻想家。虽说如此，但决定一个组织性质的毕竟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路线，而我们左派的使命，就是要保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能够在组织内占据主导地位。要达到这点，就必须要进行路线斗争，不断的用正确的路线，符合群众

根本利益（在现阶段是取得政权）的路线，来对抗其他各种各样的错误路线（特别是修正主义路线）。然而如果文字就此戛然而止，那么上面的论述就成了一句空话。毕竟正确路线不可能凭空而来，路线斗争也必须讲究一定的方法策略。

**（一）正确路线，从本质上讲就是我们对自己正确认识，即真理性认识的实践。**关于如何取得真理性认识，毛主席总结到“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在上文也提到了，组织内的路线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组织内的反映。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的一切根基都来源于我们同无产阶级群众在现实阶级斗争实践中的深刻且广泛的联系。诚然，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基于过去阶级斗争实践的理论知识也能让一个人至少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基本走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然而决定一个政治组织力量大小的，永远不在于其理论的精妙与否或理论家的妙论如何，而在于究竟有多少群众愿意跟着该组织的路线走。即使我们有十万个理论工作者，即使我们组织的再严密，再完美，但不去组织和领导群众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共产主义者一旦脱离了群众，除了仍人宰割或抱头鼠窜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正确的路线，一定是根植于群众现实的阶级斗争实践的，是需要我们运用群众路线（这是一种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来提取出来的。

此外有时正确认识首先只被一部分人所掌握，而组织整体可能却犯了错误。那么应该如何及时止损，并推广正确的认识呢？联盟认为，这需要依靠民主集中制原则。诚然，为贯彻组织的意志和无产阶级统一行动的原则，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都需要将集中统一的意见，经过民主讨论后形成的广泛意见加以坚定地贯彻执行。任何组织成员，包括持少数反对意见的同志也应当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前提是决议本身没有违背基础的纲领性原则）然而人们却往往忘记了党内民主，而实际上，这才是民主集中制的主要方面。这种民主绝不是资产阶级式的形式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巴黎公社式的和苏维埃式的民主。人们除了有支持和选择某种意见的权力以外（在“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投票权），还要有否决某种意见，罢免某些干部的权力。如果我们的组织是一个真正实干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话，那么组织中的绝大部分，都应该是深入群众斗争一线的实际工作者、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群众

本身才对。他们必然是能够从火热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和群众的交往过程中获得最直接的正确认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组织如果真正按无产阶级民主加以组织的话，那么不用说，我们的绝大部分集体决议肯定是会走在正确路线上的。而且即使偶尔犯了错，也能够通过迅速纠正过来。在历史上，列宁刚从德国回到俄国时，党内上层分子中就有不少人反对他毫不妥协的革命路线，但列宁并未就此屈就于这部分动摇的领袖的意见，而是切实的贯彻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依靠成千上万的基层党员干部，将他们的意见汇聚成了一股洪流，并最终将其变为了全党多数人的统一意见，从而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大获全胜。

**（二）正确路线，一定是在战斗中越来越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的，而不是温室中成长的脆弱花朵。**当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派领袖就特别害怕在组织内进行路线斗争，特别害怕这会破坏组织内的团结与稳定，结果最终却导致党内的矛盾逐渐激化，右派势力逐渐膨胀，整个党也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堕落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救命恩人。我们今天的马列毛主义者一定不要重蹈覆辙。我们要鼓励在组织内进行路线斗争，我们有理由相应，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能够争取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能够保持革命路线在组织内的主导地位。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要使用“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自我批评，认识到为何出错，以及如何改正。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真正团结到组织中和群众中的大多数。

**同样的公式也适用于我们对待各种泛左派的策略，为了真正地团结他们，我们反而要同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我们知道肯定会有人指责我们搞宗派主义，不懂得联合各种泛左派。但问题在于什么是“联合”？如果我们把“联合”定义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或不同团体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在一定原则下选择的统一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同任何人联合（这里我们指的是原则性的联合）的目的都必然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要求而服务的。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讲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的，我们的理论和道路绝不是哲学家或伟大导师从真空中凭空想出来的绝对正确的律令，而是在过去一百七十多年里，无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一步步总结出来，并反复被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无数具体革命实践和今天仍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进行的人民战争所反复检验的理论；是在实践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不然是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马列毛主义的呢？）

而历史和现实也同样无数次的证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妙论从

来就没有同工人运动真正大规模的结合过，几乎没有为运动争取到半点的突破，反而很多时候在起阻碍作用，更不要提靠它们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了。且不谈已经沦为和自由派没什么实际区别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就已经被驱逐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一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的托派分子也就那样。托派分子所鼓吹的什么‘工农对立’，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成为过主要的对抗性矛盾；还有他们热衷讨论的所谓‘官僚问题’，实际上和自由派天天痛骂的所谓“秦制”一样，基本就是一个空洞的靶子和好用的帽子；至于那荒谬的“世界革命论”，则是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才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够最大程度上支援世界革命的手段。这种策略不但难以推动世界革命，甚至会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葬送进去。对于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者”的人也就是贡萨罗派还值得分辨一番。我们相信绝大部分贡派朋友都是多少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被极少数顽固的接近于修正主义者甚至已经是修正主义者的贡派所误导了的。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坚持学习基础理论，并多多加以反思的话，肯定是可以继续进步并最终投向我们的队伍的；但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进步，我们反而要不断指出他们目前的问题所在。而对于极少数十分顽固的贡派分子，只要他们没啥现实影响力我们就几乎可以无视他们，而假设有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对待修正主义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了。事实上，贡派和马列毛主义主流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已经持续很久了，并且还将持续下去，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也已经在部分国内合法公开的平台同他们交锋过好多次了，写了不少优秀的文章。

实际上泛左翼的问题绝不只有我们刚谈的那么一些，但在这里实在没法全面展开论述了，我们现在只谈一点：要想真正促进那些泛左派的人进步，要想真正实现广泛的联合，要的绝不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去妥协或勉强接受对方的所谓“妥协”，而是要坚持路线斗争，坚持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逻辑来指出他们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正确或错误；唯有这样才能够在革命的旗帜下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否则当我们在错误的路线下同泛左实现了所谓的‘联合’又有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联合”甚至会让把我们本来相对正确的东西也被迫丢失了，实在是得不偿失。而若是我们能够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共识总结起来，锻造成一把利刃，并在具体事例和运动的发展中实际运用这把利刃来深刻的解剖各种现实问题的话，那么任何真正愿意推进革命而又具有基本的反思能力的人反而更容易摒弃原先错误的东西，转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从而实现真正的大联合。

与此同时，我们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现在却又迫切需要另一种联合，即真正的革命组织之间的团结。目前在中国已经诞生了新一批更先进的革命组织，它们相较于先前那些初步的组织能更好地处理线上线下、秘密公开和墙内墙外等各种工作间的分工与配合。但正是由于新生的各种组织有一定数量，而彼此之间却又缺乏联系，于是大量的革命工作（例如刊物文献的写作和编辑工作）被重复进行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被大大浪费了。但它们之间是也是可以而且应当团结起来的。

因此我们应当从统一的革命路线下的基本合作开始，互相促进各自的成长，互相帮助到各方的革命工作。从我们建立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到共同进行部分工作，乃至未来一定条件下的最终组织合并，这种联合都可以促进各加盟组织的成长，能够逐步解放我们的干部，使他们能去做更重要的工作。这种联合，必须是要有条件的，必须是基于革命斗争需要和各组织的现实要求进行的，因此这种联合必须在各组织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这也就意味着各加盟组织应具备足够在此过程中充分审视其他组织的条件，也必需具备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如果各方组织的成员基本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话，那么我们在不断地了解与合作中，日渐密切的革命工作中，自然能够不断的促进大家的信任与联合，能为我国革命力量的进步提供更大的贡献。

## 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我们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联盟现做出以下基本原则声明：

1、 联盟认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大于一切。联盟的一切工作将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

2、 联盟认为，中国目前是一个彻底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法西斯式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间的对抗性矛盾。”所以中国劳动人民一定要进行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这便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要求。而联盟将竭尽全力来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3、 马列毛主义（可简称为毛主义）是联盟唯一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列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且在可见的将来，任何人或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给马列毛主义添加任何限定词或后缀。

4、 目前联盟的阶段性的最低任务是促进我国真正马列毛组织的联合，最高任务是在中国重建列宁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5、有计划且有组织的融工项目，是联盟当下最重要的任务。这是联盟未来一切组织宣传工作的前提。

6、联盟认为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应该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尽快消除目前这种社会主义运动落后于群众自发运动的情况。

7、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是联盟一切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

8、联盟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中国的革命者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联盟毫无保留地支持其他一切工业国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以及一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特别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中修帝的斗争。

9、联盟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首先是反对中修帝），坚决抵制一切帝国主义战争和代理人战争（特别是愈发逼近的中美战争和台海战争）。联盟必须要贯彻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原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以任何形式支持垄断资产阶级当局半点。当战争爆发时，我们中国的同志要同各国马列毛主义者一道，促成本国统治阶级的垮台，用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革命战争，来代替各国劳动者自相残杀。

10、联盟反对各种形式的强制兼并，我们主张各民族、各地区的群众享有最彻底地自决权。联盟反对以任何理由，不顾某地区或某民族大多数人的自愿，强行将某地归于某个政权。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台湾问题。

11、各加盟组织在遵循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路线和以上的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应保证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特别是要在除重大政治原则分歧以外，尊重各自组织的内部管理决策和安全问题。

12、在坚持第11条的情况下，各加盟组织尽可能地、无上限地促进彼此的团结，形成更好的关系，互相帮助，以促进联盟总的工作的发展。同时，也应保证各加盟组织有权自由退出。

13、各加盟组织应委派各自代表负责各方的合作、协调和其他事宜；相关代表应集中起来讨论联盟事宜。如有矛盾分歧，应首先通过代表会议协商讨论，若仍不能解决，再各自在组织内部就相关矛盾进行更广泛共同决议。

14、各加盟组织及其成员有义务坚持以上原则。

# 《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巴库倡议)

★ 斯大林

编者按：在布尔什维克党面临实际危机时，作为地方工作领导者的斯大林直接了当地指出了党的危机和解决危机的方案。一方面强调巩固发展基层组织，恢复和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强调统一全党的工作，使各个地方小组恢复联系，并由中央统一领导。

通过阅读巴库倡议，对目前中国革命形势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线上、线下工作的相互联系，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相互联系，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的革命形势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更明确的分辨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同时了解错误路线产生的底层逻辑、实际动机。

## 《巴库倡议》正文：

谁都知道我们党正遭遇着深重的危机。党员退党，组织缩小和削弱，各个组织彼此隔离，没有统一的党的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党病了，党正遭遇着严重的危机。

**特别使党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的状态。**

有一个时期，我们各地的组织都有几千党员，领导几十万群众。那时党在群众中有牢固的根基。现在都不同了。各地组织已没有几千人，只剩下几十人，至多也不过几百人。至于领导几十万群众，那就更谈不上。固然我们党在思想上对群众有广泛的影响，群众是认识党的，群众是尊重党的。“革命后”的党和“革命前”的党的区别首先就在这里。但是党的全部影响实在也仅限于此。单有思想上的影响，那还是非常不够的。问题在于广泛的思想影响限于狭隘的组织而不能巩固起来——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状态的根源就在这里。只要指出彼得堡的情况，就立刻可以了解危机的全部严重性：彼得堡在一九〇七年约有八千党员，而现在连三四百人都难凑足了。至于处在同样状态中的莫斯科、乌拉尔、波兰、顿巴斯以及其他地方，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还不止此。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的各个组织彼此毫无**

联系，不是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而是彼此隔离。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么，高加索不知道乌拉尔在做什么，如此等等，每个地方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严格地说，过着共同生活的统一的党，也就是我们大家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引以自豪的那个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正处在最严重的手工业方式的状态中。现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一方面是“无产者报”和“呼声报”，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都没有并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系起来，不能使它们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如果以为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机关报能把早已经过小组活动阶段的党的工作连成一气，那就太奇怪了。诚然，在各个彼此隔离的组织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从思想上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东西，——它们有一个经过革命考验的共同纲领，有经过革命肯定下来的共同的实际工作原则，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正是“革命后”的党和“革命前”的党的第二个重要区别。但这还不够。因为党组织在思想上的统一还远不能把党从组织涣散和彼此隔离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连党内普通的书信往来也没有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程度。至于把党真正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

(一) 党和广大群众脱节

(二) 党组织彼此隔离

这就是党目前所遭遇着的危机的实质。

不难了解，革命本身的危机，反革命的暂时胜利，发动失败后的沉寂和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两年所享有的些微自由的完全丧失，都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原因。在革命向前推进的时候，在有自由的时候，党发展了，扩大了，巩固了。在革命退却的时候，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党就开始衰弱了。起初是知识分子脱党，随后一些最动摇的工人也脱党了。党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先进工人的成长，这局部地加速了知识分子的脱党，因为“一九〇五年知识分子”贫乏的知识已赶不上先进工人的复杂要求。

当然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将来的自由来到以前，党应当在危机中苟延残喘，像某些人错误设想的那样。要知道，第一、自由本身的到来多半取决于党是否能摆脱危机而以健壮的、新生的姿态出现，自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取得自由的条件之一是依靠组织得很好的工人政党。第二、尽人皆知的阶级斗争的法则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组织性日益加强，必然会使无产阶级的组织性

相应地加强起来。而谁都知道，先行革新我们的党——唯一的工人政党，是增强我们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组织性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自由来到以前，使党健全，使党摆脱危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全部问题在于要找出使党健全的办法，要开辟这样的途径，使党藉以

(一) 联系群众

(二) 把彼此隔离的各个组织结成统一的机体。

那末我们党怎样才能摆脱危机，为此需要采取什么办法呢？

有些人对我们说，尽量使党成为公开的党，并把它团结在公开的杜马党团的周围。但是，当最无关紧要的文化团体之类的公开机关都受到残酷压制的时候，怎能尽量使党成为公开的党呢？难道能采取放弃党的革命要求的办法吗？要知道，这是葬送党而不是革新党了！此外，既然杜马党团本身◇ 143 ◇不仅脱离群众，而且脱离党组织，它又怎能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呢？

很明显，这样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混乱，使党更难摆脱危机。

另外一些人对我们说，尽量把党的职责交给工人，以便使党摆脱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无疑地，使党摆脱不需要的客人，而把职责集中在工人自己手中，这对于党的革新工作一定会大有帮助。但是同样很明显，仅仅“转交职责”，同时却保存旧的组织系统，使用老一套的党的工作方法，从国外进行“领导”，那是不能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不能把党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显然用治标的办法是完成不了什么大事的，必须找到根本办法来根治党的疾病。

党首先苦于和群众脱节，所以无论如何要使党联系群众。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别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拿群众日益贫困的事实和资本家的进攻来说吧。大规模的歇业已像暴风似地从工人头上掠过，而缩减生产，任意解雇工人，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总之，资本家的进攻，至今还在继续着。很难想像，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厂主间发生了多少“误会”和冲突，使工人头脑中因此出现了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组织在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谁都应当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使“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摆脱”可诅咒的停滞状态。而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把他

们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

**工厂党委会就是能在群众中最有成效地开展这一工作的党的机关。参加工厂党委会的先进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围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活跃分子。**不过工厂党委会必须不倦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保卫他们的日常利益，并且把这些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其次，为了接近群众，还必须把党的其他更高级的组织建立得不仅适于保卫群众的政治利益，而且适于保卫群众的经济利益。**党组织必须不忽略任何一个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部门。为此就必须在建立组织时，除按照地区的原则外，还要采用按照生产部门的原则，例如把各种不同生产部门的工厂党委会按照生产部门分别组成各个不同的分区，再按照地区把这些分区联合为区等等。如果分区的数目增加得太多，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党组织却能获得坚固的基础并和群众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党组织的成分在解决危机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必须让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常跌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口号应当是：**“给先进分子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以参加党的各部门工作”，“给他们更广大的活动范围”！**

不言而喻，先进分子除了需要有做领导工作的愿望和主动性以外，还要有丰富的学识，而我国有学识的工人是很少的。这里就正用得着有经验而又积极的知识分子的帮助。必须建立一些高级的小组，即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即使每区建立一个也好，必须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切大可弥补先进分子的缺陷，而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演说家和思想领导者。

同时先进分子必须在他们的工厂里经常做报告，“尽量实习”，不要因为怕在听众面前“丢脸”而裹足不前。要永远抛弃过分的谦虚和在听众面前的惶恐，要大胆勇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即使在开始时失败了也不要紧，跌一两次交，你就会像“基督履海”似地行走自如了。

总之：

- (一) 根据那些和无产阶级总的阶级需要有关的日常需要，努力进行宣传**
- (二) 组织并巩固工厂党委会，作为党在各区中的最重要的据点**
- (三) 把党的最重要的职责“交给”先进分子**
- (四) 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这就是使我们的组织能够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办法**

不能不指出，解决党内危机的上述办法是实际生活本身提供的。中央区和乌拉尔早已不依靠知识分子，那里是由工人自己处理党组织的工作的。在索尔莫沃、鲁干斯克（顿巴斯）、尼古拉也夫，工人在一九〇八年印发了传单；在尼古拉也夫，除传单外，还出版了秘密的机关报。而巴库的组织，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过去和现在几乎没有放过工人和石油业主的任何一次冲突，当然，同时还进行一般的政治鼓动工作。这也就是巴库的组织直到现在还和群众保持着联系的原因之一。

党联系广大工人群众的方法就是这样。

**但是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组织彼此隔离。**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后一个问题。

**那末，怎样把彼此隔离的各个地方组织联系起来，怎样把它们集合成一个有联系的过着统一生活的党呢？**

也许可以认为时而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议就能解决这一任务，就能把各地组织联合起来。或者在国外出版的“无产者报”、“呼声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终于会把党的组织集合起来，团结起来。无疑地，不论前者或后者对于联系各地组织都有不小的作用。至少到目前为止，代表会议和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是联合彼此隔离的组织的唯一手段。但是，**第一、代表会议，而且是不常举行的**

代表会议，只能暂时把各地组织连成一气，因而这样的联系并不像所需要的那样牢固。一般说来，在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这种联系便断了，实际上仍旧用手工业方式进行工作。第二、至于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姑且不论它们运到国内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那它们当然落后于俄国的党的生活，不能及时觉察和触及工人所关切的问题，因而不能把我们的地方组织牢固地连在一起。事实证明：自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党虽能召开两次代表会议，在国外出版了几十期机关报，但是我们的组织之联结成一个真正的党这一事业，危机之解决这一事业，还只是勉强勉强地进展了一点。

因此，代表会议和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对于党内的联系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对于克服危机，对于牢固地把地方组织联合起来还是不够的。

只有在共同的党的工作中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来综合地方组织的经验，然后把已经概括起来的党的经验推广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那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工作。而全国性的报纸正可能成为这样的中心，即领导党的工作、统一和指导党的工作的中心。但是这个报纸为了能真正领导工作，必须使各地把各种询问、声明、信件、通讯、控诉、抗议、工作计划、群众所关切的问题等等源源不断地寄给它，使这个报纸和各地保持最密切最牢固的联系，从而使这个报纸掌握足够的材料，能及时觉察、触及并阐明必要的问题，根据这些材料作出必要的指示，提出必要的口号，并使这些指示和口号成为全党和一切组织的武器……

没有这些条件，党的工作就失去了领导；党的工作没有领导，就不能把各个组织牢固地团结成一个整体！

正因为如此，我们着重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在国外出版的）报纸，正是起领导作用的（而不仅仅是通俗的）报纸。**

不用说，能负责创办和领导这种报纸的唯一机关就是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工作这一任务本来就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但这个任务现在执行得不好，结果使地方组织几乎完全陷于分离状态。办得很好的全国性的报纸确能成为中央真正团结党和领导党的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中央从有名无实的核心变为名副其实的全党的核心，变为真正把党连成一气并真正在党的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核心。因此，创办和领导全国性的报纸是中央委员会直接的任务。

**总之，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报纸，使它成为把全党联合起来并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机关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克服党所遭遇的危机的办法。**

现在把上面所说的总结一下。

由于革命的危机，党内也发生了危机——党组织失掉了和群众的牢固联系，党分成了一些单独的组织。

**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这是地方的任务。必须使上述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彼此联系起来，这是中央的任务。**

**为了解决地方的任务**，在进行一般政治鼓动的同时，必须根据迫切的日常需要来进行经济鼓动，经常参与工人的斗争，建立并巩固工厂党委会，把党的职责尽可能集中在先进工人的手中，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来培养坚定而有学识的工人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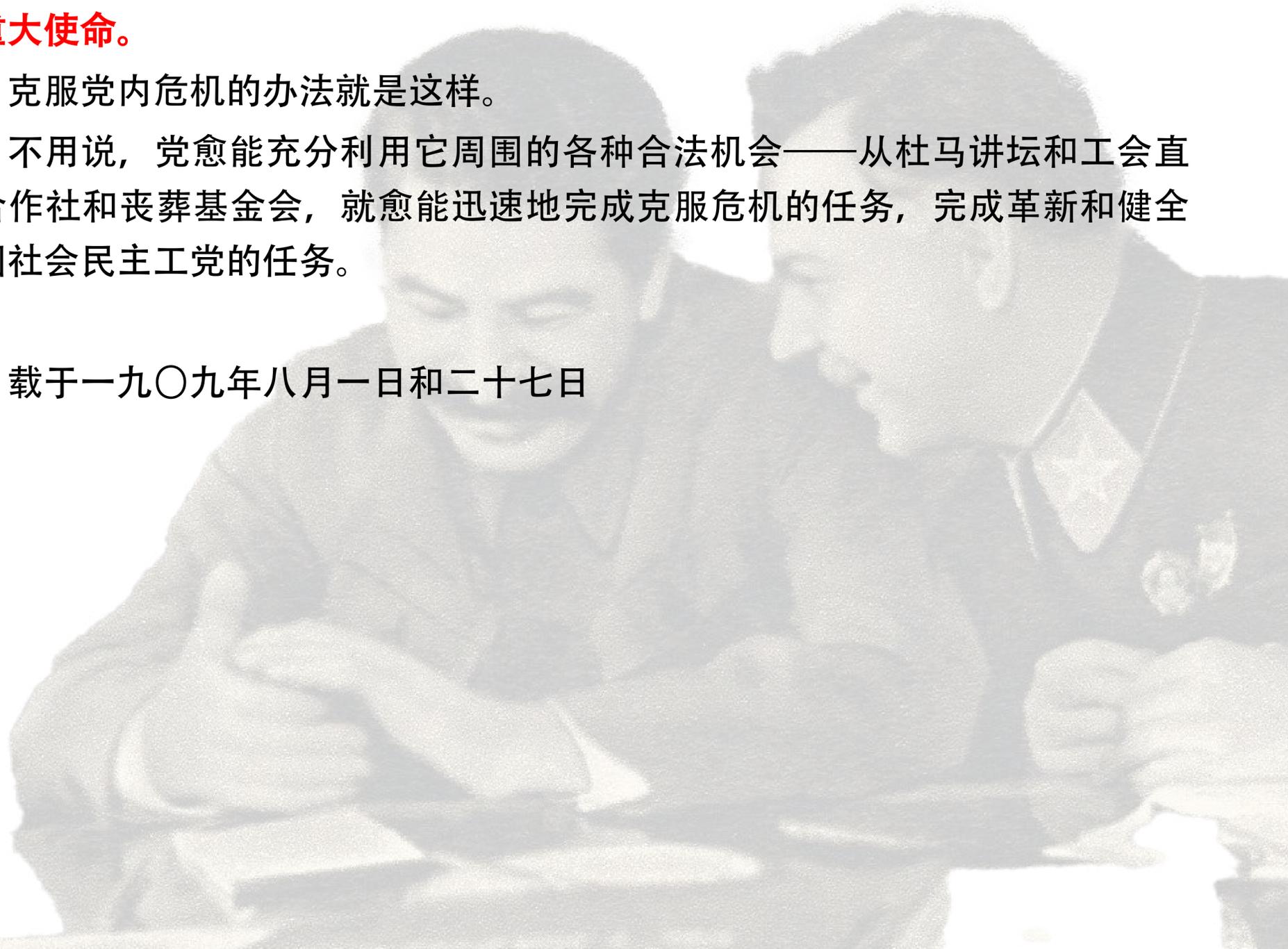
**为了解决中央的任务**，必须创办一个能把地方组织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起来并且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全国性的报纸。

**只有解决了这两个任务，党才能摆脱危机而以健壮的新生的姿态出现；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党才能扭负起英勇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名副其实的先锋队这一重大使命。**

克服党内危机的办法就是这样。

不用说，党愈能充分利用它周围的各种合法机会——从杜马讲坛和工会直到合作社和丧葬基金会，就愈能迅速地完成任务，完成革新和健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

载于一九〇九年八月一日和二十七日



# 韶山纪念活动对我国革命的意义

★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

就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和实际革命工作的需要而言，我国的革命者一定要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解决以上所指出的问题，要带动更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一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绝不满足于现状，如果想要推动和实现我国革命，我们就要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把韶山纪念活动和其他一切群众运动发展到革命运动的高度。具体说来就是要组织起一个先锋式的活动家队伍以革命路线去工作，要增加工人阶级的活动和实现先锋队式的领导，提高其他社会群体的革命性和发展这些群体革命运动，把他们都拉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中来，利用他们力量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增加我们到工人中去的工作力量。

## 一. 纪念活动的意义和问题

今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的130周年诞辰，对于世界和中国革命群众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在农村、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区、在印度和菲律宾的革命根据地，全世界的革命群众都在纪念他。在中国也是这样，当中国的剥削阶级在疯狂的诋毁、诽谤或无害化、神像化这个伟大的革命家的时候，当各种庸俗人物用民族主义、商人思维或其他资产阶级思想来曲解他的时候，我国许多革命群众在这一天从全国各地赶往韶山以革命的名义来纪念他，无数的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和全国各行各业的群体在此时此刻打出来不同程度上象征革命意义的旗帜和口号。这证明，我国有着相当一批革命群众早已看穿了、厌恶了一切剥削阶级和俗人的阉割、歪曲或庸俗化他所代表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学说的革命性质的行为，也厌恶了当代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制度。

仅2023年12月25日到26日一天的时间内韶山景区就接待了11.157万游客，同比2022年增长712.93%，同比2019年增长13.92%。除了特殊周年和之前疫情的影响结束造成的因素外，如果我们看早年数据也能发现稳步增加的现象，在2008年到2019年的12年间，韶山全年游客接待量从2008年的360万人次到2019年的2563万人次，12年间翻了7倍。直到疫情封控的

2020-2022年时期才下滑到了平均约一千万人次左右的程度。

今年的韶山纪念活动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并大量增长的事实足以说明我国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源泉之深厚。它说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当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越是发展、整个被剥削阶级的革命思想越觉悟，人民群众与他们的解放命运直接关联的伟大革命家的感情也就越深、纪念活动也就可能越庞大。在整个韶山纪念运动中，警察微薄的力量基本难以对群众们的活动造成任何有力的阻碍，群众洪流淹没了他们。一些群众发现，他们这个情况下进行激进的活动时警察已经无力制止了，因此有一些激进的群众开始挥舞着最激进的旗帜、喊着最激进的口号（如“继续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他们赢得了其他许多群众的叫好；而警察们至多只能躲在人群里拍照记下最激进活动的分子（而这是可以相当的预防或反击的）。

韶山的纪念活动是特殊的活动，它是我国全国的左派群体集中起来带领着其他群众形成的群众活动和革命活动的浪潮，当这样的力量集中在一小片地区时也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地方的统治阶级力量就显得极为弱小了。韶山纪念活动的发展也证明着我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它也证明了，在强大的群众力量面前时，压迫者的力量是渺小的，在这样力量面前，他们的专制也就失效。

同时我们也能发现，韶山纪念活动中还没有我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身影，整个活动的运行还是由各种认识不足的群体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自发的主导着。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组织，就不可能使运动发展为有纪律的、有自觉性的；并且从长远的方向来说，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一切群众和一切社会运动进行有党性的高度组织，我国革命胜利命就不可能。因此，这个革命运动的初级性还体现在缺乏工人阶级、缺乏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他们的领导。因此，我们应该利用起现在的运动发展我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使他和一切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使一切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都纳入到革命工人阶级的轨道中来。

因为缺乏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其他因素，韶山的活动中存在着种种不足，这些不足也体现着我国革命运动的初级性、幼年性。整个活动的组织性、自觉性不足，绝大多数群众的活动仅仅停留于纪念毛泽东同志的程度，喊激进口号也还只是较少数人，有革命愿望或者说敢于表达革命愿望的也同样是少数。并且，整个纪念活动又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小群体的单独活动所组成的，老、中、青和各个地区以及各种人群、团队之间各自进行单独的自发纪念活动；而当整个纪念活动结束后，这些团体的运动也就基本结束了，仿佛这些团体的存在意义只是为了纪念。也就是说整个运动还存在着相当的自发性、分散性、缺乏组

织性；并且运动的潜力并没有被充分的利用和开发，运动还缺乏继承性。

但韶山运动也是我国目前最有革命性质的运动，我们在一切地方都能发现这种革命运动的初级性，它足以体现我国革命运动的初级性；但好情况是，这个幼年的革命活动正以一种令人欣喜的态势发展，它为我们展现了种种可能，它有可能通过我国革命分子的出色工作而迅速的走向成熟。

韶山纪念活动的盛状既能让一切革命分子和进步群众感到欣喜和鼓舞；而在另外一方面，现存运动中的问题却不能不让一切想要真正实现人民解放和社会革命事业的人感到不足，如果不能花极大精力和专门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把运动充分的利用和发展起来，这股庞大的进步群众的斗争力量就不能转化为一股自觉的社会革命的力量。换句话说：真正的革命者是绝不满足一切社会运动的现状的，他是一定要争取把运动发展到更高程度并利用每一个运动的力量来继续推动整个社会革命事业的。因此，我们绝不允许让韶山纪念活动停留在目前这种初级性的程度上，使它始终只限于各种小团体自发的纪念伟人和喊革命口号的程度，我们绝不允许非无产阶级的、非党性的、隔离性、自发性、分散性、缺乏组织性的情况长存。

## 二. 纪念活动的首要不足

整个韶山的纪念活动，是群众自发纪念革命领袖的浪潮、以及许多高喊革命口号的浪潮，这个浪潮又在纪念结束后迅速低落下去。虽然整个活动鲜明的体现了群众们的革命意愿，但活动仅仅只限于此纪念和喊口号的程度，没有更多的去实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行动，没有力量使活动以其他的形式延续下去，这样程度的活动是不能产生革命和完成社会革命事业的。能颠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只能是阶级的工人的运动，这样的工人运动必须是有党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性）。

一切群众运动和革命活动要发展到革命程度就一定要被有党性的革命的工人阶级所领导。各种对革命认识不足、或实现革命的动力、能力不足的分分子或被运动裹挟着的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运动是一定达不到革命的高度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普遍认识不足的老年人还是喊最激进的年轻人，他们基本都对实现革命没有任何动力、也缺乏有力的革命实践，他们对革命还是茫然的，不知道怎么做和该做什么，往往这个活动就是他们干过最“革命”的事情了。

没有人去领导他们、教育他们，没有人去组织他们。因此以革命活动的标准来判断，整个活动的首要不足，就在于没有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身影，更没

有党性的革命工人阶级的领导；一句话：缺乏工人阶级活动和先锋队式的领导。因为存在这种不足，活动始终是非无产阶级的、非党性的。

**因此革命工作者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在这样的活动中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它转变为工人阶级式的活动，并以先锋队式的方法领导它。**

在未来类似的革命活动中，我们需要有一支专门的活动家队伍怀揣革命的使命去工作，这样队伍已经可以看作是某种程度的先锋队了。我们也需要鲜明的喊出革命口号，并且还要鲜明打出实现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的口号，再可行的时候（力量允许、能够基本自保、有许多群众能接受的时候）还能打出重建共产党的口号。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进行组织活动，散发相关传单来宣传和组织群众，并把要把现有的群众组织和激进分子以适当的方式联系和组织起来。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在于提高其他社会群体的革命性和发展这些群体革命运动以外，也在于要把他们都拉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中来，利用他们力量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增加我们目前到工人中去的工作力量。我们必须出色的完成这样的工作。

### 三. 运动中的各群体的特点和组织问题

因为缺乏工人阶级活动和先锋队式的领导，目前的活动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式的。但活动中不同群体的特点和组织问题也需要注意。

整个韶山纪念活动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地点内集中了全国许多左翼群众和其他群众在局部地区形成了难以忽视的力量，但一切参与了活动或者做了较详细调查研究的人就可以发现，整个活动是由无数个小团体、小组织构成的，他们各自进行了相对独立的纪念活动。有的唱歌、有的游行、有的喊口号，因为其所处组织或团体的不同所以也表现为广场上各自存在着各自独立的唱歌、游行、喊口号的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大约每七八米的范围内就要存着一个不一样的组织唱红歌、不同的游行方阵、喊不同的口号的活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内容是有差别的，但有的时候甚至是完全没有内容差别的活动却是由两个不同的群体在彼此相距很近的范围内各自独自进行，如同样唱国际歌团体在毛泽东广场一带至少就同时存在好几十个，而这本可以形成一个团体来组织进行。

然后是各群体之间的独立，如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各自相对独立的情况，这种情况也主要是通过组织和组织活动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团体总是由其中一个群体主要构成的，甚至绝大多数团体一开始都完全是由一种群体的人组成的，只是在运动中时吸引了部分其他团体参与或吸引了没

有组织的其他群体的个体人员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活动的力量就是相对分散的，分散力量导致各个小团体只能做一些局限活动、并且更大程度的受限于其本身群体特征的影响，因此这种分散现在阻碍着革命组织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想要使得整个运动更具革命性和组织性，我们的先锋队首先就要力求破除各群体和各现有组织之间的相对隔离性，要把各群体的组织活动以革命性质为基础相当的和适当的集中起来，形成更大和更有纪律的组织群体（它的发展终点就是以革命路线和方阵为指导行动的，包含所有参与群众的有纪律的组织），只有这样运动才有条件能超出纯粹的纪念活动本身而发展为更高级的革命运动。

就每个群体的情况而言，老年人群体的组织更为庞大、更有纪律性，所有大规模游行方阵和需要较高技术性和组织性的活动基本都是由老年人组织起来的，三四十人以上的有组织的活动基本都是他们发起的。如，列队演奏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方阵是本次韶山活动中最大的组织活动，全队基本全由老年人构成，整体以军队方阵前进、有多种乐器手排列演奏、有专门的人以一种比较有序的结构举横幅和旗帜。但同时，老年团队的问题在于，相对年轻人和中年人团体，在他们活动中，口号、旗帜、歌曲等内容都相对保守和温和。比如为毛主席庆生的老年人方队，就是一个内容看似很无害、很中性的方队，但对于我国被压迫者来说，韶山纪念日 and 我国革命运动是绝不能满足于无害化和纯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内容的，如果这样的内容构成了韶山活动的主流，那反而是有害的（但目前来看他们确实是占了相当大一股的影响力量的），因为它恰恰代表着整个运动的政治性质的消极和不发展因素；如果说这样的活动在整个运动中有什么进步因素的话，那只是纯粹的组织性上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是第二性的，再有组织、再大规模的纯纪念活动也不会丝毫的推动革命运动的质的发展。

因此，韶山纪念运动中的大多数老年团活动的一般特点就在于规模的庞大、组织的有纪律和革命灵魂的丧失。这种丧失恰恰是代表我国资产阶级要把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社会运动和革命学说无害化、庸俗化的利益的。所以他们虽然是韶山整个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年轻人），也是最有组织、纪律的部分，但反而却是最不受警察关心的那一部分。因此，就针对于老年组织的问题来讲，我们得让他们的活动革命化。

中年团体的独立组织活动是本次运动中三大团体里最少的，往往很难发现他们领导组织活动，他们的情况也是相对最复杂的。如果参与了本次韶山活动的人进行一些特意的观察就不难发现，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初的群体也是本次活动中相对最少的部分，六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以上的老年群体和就是九十年

代末及之后的年轻人群体是相对最大的两个群体，如果要描绘一个韶山运动的大致年龄构成图，那么葫芦状就是最恰当的。

中年群体缺乏组织活动，他们大多都是以极为分散的个体或小家庭、亲友的模式来参与本次组织活动的，因此这个群体很多时候是以一定规模的后来参与者身份加入到老年人组织的活动中，或是零星参与到年轻人组织的小团体活动中。所以，他们中的部分能够跟着老年人组织的方队进行活动，也能够跟着别的组织群体一起唱红歌，其中部分也能够和年轻人一起喊最激进的口号，借年轻人的激进旗帜进行挥舞、拍照留念等等。因为这个群众缺乏较为普遍的组织活动，所以我们就无法通过其普遍的独立组织活动的情况来判断其性质。一些八零后中年人的交流就可以反应这个群体的问题，他们对大量年轻人的参与感到惊喜，同时也对自己这一代左派分子的稀少感到不足，他们往往归结于特色当年教育的毒害和资本主义思想在他们这一代的流行。当然，问题肯定不会那么简单，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也缺乏材料去深究这个问题。所以在整个韶山运动中，中年群体目前的特点是人数少、缺乏独立的组织活动、活动分散、依附其他群体的组织进行活动。但由于这些性质他们也是容易争取和拉拢过来的，我们的先锋队在组织活动中应该重视争取和组织起这些分散的中年群体到我们的轨道中。

年轻人是本次运动中最多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组织活动所反应出的特征恰恰和老年人相反。整个运动中的大多数组织团体都是由这个群体组成的，但整个运动中的所有小团体组织基本也是由他们构成的，和老年人组织相比，年轻人组织明显更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无法进行高难度和高要求的组织活动；但他们往往也是最积极的群体，最有革命性的口号基本都是这个群体喊出的，如：“继续革命”“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消灭资本主义”“打倒走资派”；最革命的旗帜也是由年轻人群体打出的，当老年人大方队举着“为毛主席庆生”“毛泽东同志生日快乐”的旗帜游行时，年轻人在周边打出了如“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共产国际、国际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当老年人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唱祖国》和《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时，年轻人往往更爱唱《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带有更明显革命性质的歌曲或者同样带有革命性质但相对冷门的如《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等歌曲。因此更具革命性质是这个群体的最显著特点。

这些年轻人也更被警察重视，在一些最激进口号、旗帜的活动产生后，虽然由于群众运动集体力量强大而使势单力薄的警察不敢做过激行动，但他们

也试图混迹进这些人群，偷偷拍下来其中的最活跃者，这自然是为了方便他们日后算账的（当然这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带上口罩、帽子进行活动，然后让其他的群体一起保护和遮掩好他，那么是可以有效的避免被记录的，当然其他的行为也是可以相当的预防的。所以，我们就能发现，当群众力量汇集起来的时候，警察的力量就显得极其弱小了，即使喊着最危险的口号，也不会遭到任何有力的打击，剥削阶级的专制在群众力量的面前也就失效了。

比起老年人团体往往是提前好几十个人组织好了的有序活动，年轻人的组织活动往往是这样实现的：一个人举着旗帜、三五个好友帮忙，一起唱歌或者喊口号，马上就聚集起了更多的年轻人和一些中年人的参与（老年人参与最少），然后由这样少数人带领着一起唱歌和喊口号。有部分年轻人组织团体也做了一定的艺术活动，但本次活动中最具技术性的年轻人组织活动就是一个人举旗帜，另一个年轻人拿着一个乐器进行演奏和领唱，其他的人包围着他唱歌和最后一起喊口号。所以，年轻的人组织更像是临时凑起来的。

年轻人的组织活动也更能显著的体现我国革命运动的初级性。刚刚发展起来的具有更鲜明革命特征的活动，极少数的带头人、零时聚集起来的散乱组织。因此年轻人的组织活动代表的是目前整个运动的政治性中的革命性，是运动的最积极的灵魂，但同时他们也代表着韶山纪念运动中的无组织性和分散性。但这种革命灵魂还没有到革命无产阶级的高度，他们只是相比另外两个团体更进步一些。但我们的先锋队应该重点争取这个团体，使他们在革命无产阶级路线和组织的领导下达到革命的高度。并且年轻人也是更有条件大量参与到我国革命无产阶级事业中来的群体，到工人中去的事业只有他们最有条件做。所以我们既要提高他们的革命性、组织性，还要教育他们参与到我国的工人事业中来。

**因此，对于类似韶山纪念活动的运动，我们先锋队应该针对各群体组织活动的特征这样进行活动：**

1. 首先要增加工人阶级的活动和实现先锋队式的领导。这就要破除各群体和各现有组织之间的隔离性，并解决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不足，争取把所有群众集中起来活动，形成更大和更有纪律的组织群体，发展超出现有活动内容的革命运动。

2. 对于年轻群体，他们是目前最革命的部分，我们要使他们成为我们领导的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使他们迅速的提高到革命无产阶级路线的程度来活动。

3. 对于中年群众，他们是情况最复杂但最容易争取的部分，我们要吸纳他们并改造他们。

4. 对于老年群体，他们是目前相对保守却最有力量和组织的群体，我们要更慎重的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争取逐步的团结、领导和改造他们的。

## 五. 最后

韶山纪念活动是一场特殊的社会运动，它是一个宝贵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历史材料，是社会运动科学的关键素材。它丰富的体现出了革命运动初级形态的种种特征，使我们能够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发现其特点并有条件改变它，它告诉了我们种种实践中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点；当然，它还有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和群众斗争关系、所反映出的特殊的群众运动的方面），但那些次要方面就不是我们现在要重视的了，那将成为未来的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要去关系的東西。由于韶山纪念活动是目前我国最具革命性的运动，因此解决它的问题也有指导我们未来进行和发展其他革命运动的帮助。

**就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和实际革命工作的需要而言，我国的革命者一定要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解决以上所指出的问题，要带动更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一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绝不满足于现状，如果想要推动和实现我国革命，我们就要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把韶山纪念活动和其他一切群众运动发展到革命运动的高度。具体说来就是要组织起一个先锋式的活动家队伍以革命路线去工作，要增加工人阶级的活动和实现先锋队式的领导，提高其他社会群体的革命性和发展这些群体革命运动，把他们都拉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中来，利用他们力量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增加我们到工人中去的工作力量。

斗争月刊为发刊于二零二三年九月的数码刊物，  
由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领衔制作。

订阅月刊，联系我们：

[douzhengyuekan@proton.me](mailto:douzhengyuekan@proton.me)

此外也可以通过 telegram（电报）搜索

中国革命交流群：

[https://t.me/China\\_Douzheng](https://t.me/China_Douzheng)

斗争战线：

<https://t.me/douzhengmlm2>

丧钟：

<https://t.me/knellofcapitalism>

以获得更多刊物，学习了解斗争理论、斗争技术、斗争经验，  
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 性产业的走访调查（一）——站街篇

★ 何煜燎

作为工人阶级最熟悉的性产业模式，站街就像个烙印烙在了工人阶级身上。它廉价，它快速，它出现在工厂的出口，它出现在员工宿舍的路上，它出现在光线昏暗的转角，挑动着下班工人麻木的神经。

笔者将对城市区域的站街这一经营模式进行总结（工业区的站街模式有所不同），以期读者们能深化认识，了解现状。

## 一、站街区域在城市中分布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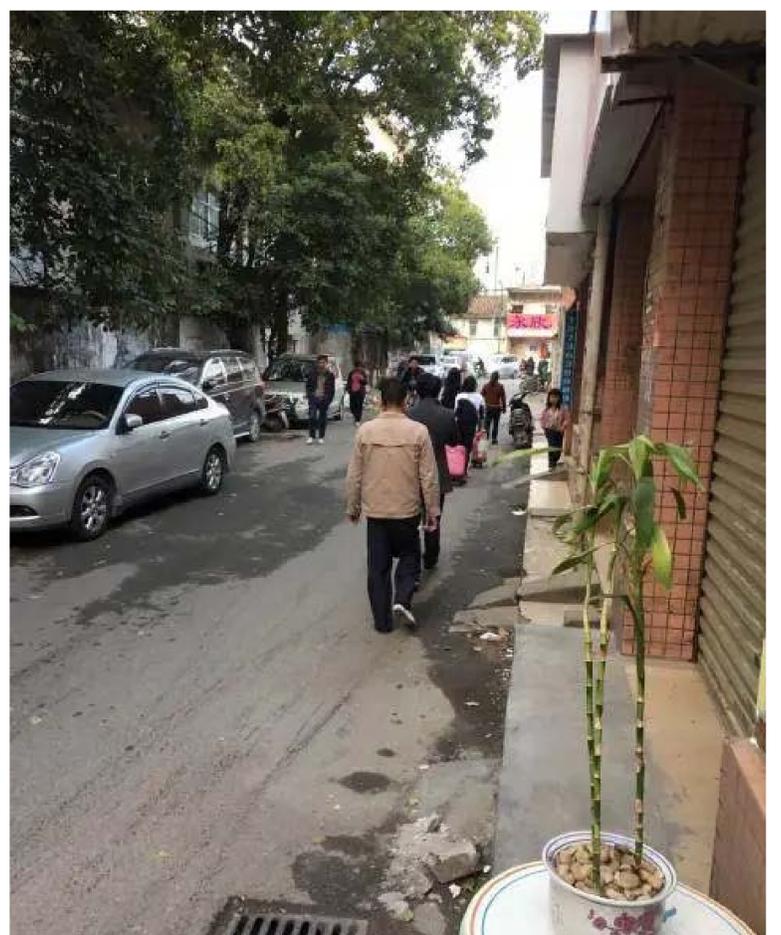
站街区域总是紧邻着大路（两车道三车道四车道）存在，大路的人行道拐入小巷即是站街区域，这一个情况在调查的十多个样本中无一例外，同时周围大概率有餐饮街。

从交通便利和客人流量的角度来看也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这种情况会让人有一种怪诞的感受。上一秒还在光鲜亮丽的世界，明亮空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下一秒就到了堕落黑暗的世界，遮遮掩掩，百鬼夜行，物欲横流。

让人不禁感叹，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系统，就像一个劣质的谎言，随处可见它的反面。

老城区的住宅区街道便是一个常见的选址。因为建设于十多二十年前，这里树木茂密，路灯昏暗，车辆稀少，街道狭窄，是做见不得人的交易的理想场所。同时因为历史悠久，附近的市民口口相传，有着较大知名度，带来更多的客流量，方便揽客。老住宅区还有廉价的房屋方便出租，作为性交易的场所，降低成本。综合这几个原因，城市中广为人知的站街区域基本都是老城区的住宅区街道。

在城市中，平均 20-40w 人便有一个较大的站街区域（街道有效长度 200m 以上，活跃期现场性工作者 20 人以上），与其余



一种常见站街街道结构  
(树荫多, 灯照少, 有路边停车创造躲藏空间)

众多规模较小的站街区域，组成了一张网覆盖了整个城市。

## 二、站街人群行为特征

当我们发现，有很多错误的人（独自一人的男性），在不合时宜的时间（晚上十点），出现在不合时宜的地点（人烟稀少的昏暗的街道），做着不合时宜的事（慢慢游荡，四处观望）。我们基本可以猜测这个地方是站街区域了，这些人是嫖客，这种氛围是相当明显的。

我们又可以发现，在阴影中躲着一些人影，穿着较为亮丽，同样在四处张望行人，希望和人对上眼神。同时又较为警惕，注意着街道的两端（看是否有警车进入街道）。这些是单独从业的性工作者。

还有一些三三两两聚在路灯下有说有笑的男性女性，背后是某些小径或铺面的入口，这些基本就是专门招揽客人的人（生产关系不同于老鸨）。他们因为不是本人犯罪所以不需要担忧，可以站在较为明显的地方，通过交谈吸引路人注意。

基本城市的站街区域以这几种人群最为典型，工业区的站街区域可能要更加简单直白，快节奏一点，所以特征可能有所不同，这点需要之后确认。

## 三、站街区域性产业运行的具体方式

站街区域主要活跃在晚上 9:00-12:00，在这个时候路边的阴影处站有性工作者以及为性工作者招揽客人的人。

“哥哥要玩吗？”

“哥哥这里。”

“要不要玩一下，哥哥？”

阴影中的小姐这么说道，

“要不要上去玩？”

“耍不要一下，兄弟。”

“你看这两个咋样？”

门口揽客的人这么说道。

如果明确不以嫖娼为目的的经过街区，是不会被叫住的，只会感受到多股视线在身上停留片刻便移开。嫖客的表现还是较为明显的，容易识别，性工作



较为狭窄的站街区域

者会叫住路过的嫖客，或者嫖客站在原地，性工作者会上前攀谈，嫖客看上眼后便可以开始交流细节（服务内容、价格）。

嫖客在和性工作者确认交易的价格后（站街 100-200 不等，不包括额外服务），便会由性工作者带领嫖客去到进行性交易的场所，一般是性工作者租的出租屋，或者合伙租赁的套房。帮助招揽顾客的人也是同理，只不过会多一个挑选性工作者的环节。给钱后的事情便不用再描述。

#### 四、站街区域与警察系统

站街模式可以算是公安部门管理最频繁的性产业模式，因为这里的性工作者、嫖客，力量分散，易打压。同时和市民生活靠的过近，容易对城市“产生负面影响”。

政府一般有这么几种方式来压制、驱散站街区域。

**强度从低到高依次是：张贴告示牌、街道改造、安装爆闪灯座、警车巡逻、警车停驻**

**张贴告示牌**，即是诸如“该区域已化为重点监控区域”等此类文字告示牌被放在站街区域的关键路口，有着一定的威慑作用，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效果不能说没有，只能说不多。

**街道改造**，这实际上是最有潜力的操作方式，将昏暗的小路改造成宽阔，明亮的大路，便可以彻底消除这一条街作为站街区域的可能。但实际上政府常常只会做一些修剪树枝、移除绿荫、修复路灯的操作，街道整体结构没变，昏暗的地方还是很昏暗，效果有限。

**安装爆闪灯座**，在站街区域的主要位置安装爆闪灯座，警车上的爆闪光线不断的扫过站街区域，以此警示站街区域的不法分子。颇有一种圣旨到了就是皇帝到了的感觉，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但是爆闪灯的压制力还是非同一般，站街区域的交易明显减少了很多。

**警车巡逻**，目前看来应该是各城市站街区域主要的驱散方式。警车时常从站街区域中开过，嫖客们



爆闪灯用于警示站街区域

倒是仍然像散布一样慢悠悠的走动，性工作者们则需要遥相呼告，相互提醒，躲到阴影深处，不出现到警车的可视区域中，时不时探头看一看警车没有走远，走远后又恢复正常的站街。如果警车经过的太频繁，不再有嫖客路过，今天的生意基本就宣告结束。

**警车停驻**，这是较少使用但又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一台警车，往站街区域中心一停，短时间内不会有任何性工作会出现在这片区域了，毕竟被抓进去罚款能顶十多二十天的工作。只会剩下心存侥幸的嫖客，在警车的爆闪灯照射下意犹未尽地走来走去。

以上几种方式，基本就是国家机器对性产业的站街模式措施的大致写照。不过需要指出来的是，性产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背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机器对它怎么消灭，它也不可能消失的。

## 五、站街模式总结

综上，站街模式的大致状况便是如此，笔者也只能带来一些相对较为表层的观察和认识，对“站街模式的性产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这方面的认识是不如早早扎根在工厂的造反派前辈们的。

站街模式作为国企下岗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便兴起的性产业模式，盘踞在中国大地上已有四十年有余，它像寄生虫一样趴在工人身上吸血已有四十年有余，不过它仍然是工人群体的常见娱乐之一（这个常见的程度比大多数同志想象的都要高）。面对这一性产业模式，我们应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对工人做实际工作为目的，利用对性产业的理性认识，对具体的工人进行具体的分析。

# 群众路线的起源和发展

## ——《群众路线与美国革命运动》

★ 斗争公社译

任何的理论都不会是一蹴而就地蹦出来，也不会是来自于某个大人物的顶层设计，它必须来自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即是在不断地试错和总结中得出的，并会随着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而形成、发展、推翻。

本文翻译自美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斯科特·哈里森 (Scott Harrion) 的《群众路线与美国革命运动》的第32章。

群众路线的理论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何其他部分或物理科学的任何理论一样，有其起源和发展历史。它并非一直存在，也并非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全然诞生。

自从19世纪40年代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开始的早期革命活动以来，关于革命领导的正确和错误方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这十六个十年里，无产阶级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这些成功和失败中，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们学到了许多领导的基本原则，并且经常非常好地利用它们。然而，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无产阶级领导仍然只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被隐含使用的原则已经被科学地总结出来，以至于今天无产阶级领导的艺术已经成为——虽然只是部分地——无产阶级领导的科学。在这个领域中最大的两个进步是：

1) 无产阶级党的组织原则的阐述，包括其结构和领导群众的角色，这主要归功于列宁。

2) 群众路线理论的阐述，这主要归功于毛泽东。

在说群众路线的理论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时，我并不希望否认列宁和毛之前的其他人有时非常成功地使用了群众路线方法；事实上，如果没有使用群众路线方法，十月革命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毛之前就提出了群众路线理论的一些方面。这篇论文中已经提到了许多这些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中还会发现其他方面。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

将群众路线提升到了完全意识到的理论的水平，他阐述了它，指出了它的各个方面或元素及其相互联系，这确实是他的一项伟大成就，全世界的人民都对此感激。

当然，早在马克思主义存在之前，就有一些人认识到了群众的智慧，他们也许可以被认为对类似群众路线方法有所了解。200多年前，孟德斯鸠就评论说：“为了做大事，不必超越其他人，只需与他们在一起。” [1] 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现代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伽利略，有意识地寻求从有直接经验的群众那里学习物理现象的科学解释。他在他的伟大著作《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1632）中总结和编纂的力学的科学原理，他主要是从制造和试验大炮和其他武器的工匠那里学到的——正如他在书的第一句话中感激地承认的那样。伽利略还说过：“我从未遇到过一个真正无知的人以至于我无法从他那里学到哪怕一点东西。” [2]

### 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一个更好的例子是伟大的革命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和他著名的小册子《常识》（1776）。《常识》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品之一；它在为反对大不列颠的革命战争准备公众舆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潘恩汇集了大量的论点，反对一个遥远的岛屿统治一个大陆的荒谬，反对国王的整个观念，赞成共和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但是这些论点绝不是潘恩原创的。

历史学家埃里克·福纳写道 约翰·亚当斯总是对《常识》被认为对独立运动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感到不满。他坚称，关于那个主题的讨论，只是“我在国会反复强调了九个月的论点的一个可以接受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亚当斯是对的，但他没有理解潘恩小册子的天才之处。《常识》确实表达了在殖民地中流传已久的观念——美洲与欧洲的分离，旧世界的腐败和新世界的纯真，世袭特权的荒谬和未来美国帝国的可能性。这些观念都不是潘恩原创的。真正创新的是潘恩如何将它们结合成一个全面的论点，并将它们与美国人的共同经验联系起来。 [3]

潘恩从四面八方收集他的论点，这些论点和观念在少数群众中酝酿已久，



托马斯·潘恩

他选择了这些论点中最先进、最激进的，这些论点在那种情况下最有效，并将它们结合成一个极其强大的革命路线。然后，这本小册子以当时的巨大数量传播出去——它被返回给了群众——并被他们采纳为前进的道路。福纳引用了一个对潘恩说的人的话：

**你已经表达了数百万人的情感。你的作品可以恰当地比作一场洪水，席卷一切。我们曾经是盲目的，但在阅读这些启发性的文字后，我们的眼睛已经睁开了。[4]**

此外，潘恩对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非常清楚。他自己就是一个工匠，他故意以群众的风格为群众写作：

《常识》，以一种旨在吸引广大读者的风格写成，是美国政治争论和参与的爆发核心，它打破了狭窄的精英阶层的界限，影响了“所有阶层”的美国人。关于《常识》的第一件事，当代人注意到的是它的愤怒的语气——当代人认为潘恩的“大胆无礼”和“不寻常的狂热”，与以前的美国政治小册子的法律化、逻辑化的论点与其中“得体和合理”的语言相去甚远——潘恩是政治写作新风格的有意识的先驱，这种修辞旨在将政治讨论扩展到18世纪的“政治国家”的狭窄界限之外。“因为我打算让那些几乎不会读书的人理解，”他曾经写道，“所以我将避免任何文学装饰，并用像字母表一样简单的语言表达。”他假定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任何权威的知识，为他使用的少数拉丁语短语提供即时的翻译，并避免花哨的语言，以打动更有修养的读者。[5]

尽管在历史上绝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例子，但我所知道的，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托马斯·潘恩的《常识》是像群众路线这样的东西成功使用的最好的例子。但是，“像群众路线这样的东西”还不完全是群众路线。因为按照适当的定义，群众路线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集中群众的思想，所以，严格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群众路线是不存在的。

## 《共产党宣言》

群众路线的最初使用是什么？有强有力的理由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过程中遵循的程序！（马克思主义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就像人类的知识一般！）

毛泽东曾经反问，马克思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通过在他年轻时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吗？显然不是；他和恩格斯从非马克思主义中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德尔克·J·斯特鲁克（Dirk J. Struik）在他关于《共产党宣言》诞生的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直接点出了我

的观点：

《宣言》代表了思想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社会主义在许多不同的学派和教派中蓬勃发展，是一种混合了辉煌的洞察、充满希望的愿望、激进的呼喊和大胆行动的混合物。它是不连贯的，其过程就像一艘船被四面八方的风吹过水面，无法设定自己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是寻找许多理论中的健全元素，用当代最好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以及革命斗争的积累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发现。他们将他们的发现整合到一个新的、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就像每一个伟大的理论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起源于对散乱的事实和教条的创造性综合，许多已经知道的，但现在被新的和更深入的洞察所照亮。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的领域提升到了科学的领域。[6]

斯特鲁伊克指出，这种综合基本上是在1843年到1845年之间完成的，接下来的三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进一步的自我澄清，通过政治斗争和历史经济学的研究来检验他们的观点。”然后在1848年2月，新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

我希望你能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遵循的程序与本书中介绍的群众路线理论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他们收集了许多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用当时最好的社会理论（即使那时只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和对历史（过去的经验）和客观情况的研究来处理这些观点，然后将浓缩和强大的结果以仍然困扰资产阶级的形式返回给群众。这无疑是一种直观的程序，但是它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似乎确实是这样，群众路线作为一种彻底的，尽管仍然是隐含的和直观的程序，与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教条。随着教条的发展，方法也在发展。

### 提升群众路线到意识理论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开始了群众路线革命领导方法的或多或少无意识的出现和使用，尽管因为它仍然是无意识的，并且留在艺术而不是科学的形式中，必须承认，它的应用通常不如可能的那样一致和彻底。

作为一种完全自觉的领导理论，群众路线只是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开始制定的。毛泽东本人在1948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群众工作，并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在谈论群众路线。[7] 这将使群众路线理论的起源定位在大约1936年；换句话说，就是在延安时期的开始。[8] 然而，我们能够看

到的关于群众路线理论的第一份详细的书面描述出现在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 尽管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

我不知道谁最早开始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来指代现在以这个名字被称呼的革命领导方法。显然, 这个词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它被归功于包括周恩来 [9] 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关于“群众路线”这个名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本章下文和第 37 章。

然而, 在他的经典 1943 年的论文之前, 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简短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例如, 在他 1942 年的著名演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他说:

**“革命的政治家, 那些懂得革命政治科学或艺术的政治专家, 只是数以百万计的政治家——群众的领导者。他们的任务是收集这些群众政治家的意见, 筛选和提炼它们, 然后将它们返回给群众, 群众然后接受它们并将它们付诸实践。”**[10]

事实上, 早在延安时期之前, 毛泽东就在这里那里谈论了最终被称为群众路线的各个方面。甚至他在 1919 年写的一篇杂志文章“人民的大联合”,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 就包含了一些群众路线的暗示, 包括对群众智慧和力量的极大尊重, 以及对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斗争作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唯一途径的极大赞赏。[11]

毛泽东并没有一下子就阐述出群众路线的理论。相反, 对他早期著作的研究显示, 早在他 1943 年的经典论述之前, 就有许多步骤朝着这个理论的方向迈进。此外——这是大多数评论群众路线的人未能认识到的一点——即使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本身也没有对群众路线方法的所有方面进行完整和详尽的描述。由于即使是对群众路线表示同情的汉学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有时会争论说“群众路线的概念……甚至被毛泽东自己定义得相当模糊”。[12]

我已经在第二章强调过, 毛泽东在 1943 年的经典论述中并没有涉及群众路线理论的所有方面,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是提醒读者, 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 (1943 年)

发现有必要在许多后来的场合进一步阐述群众路线的理论，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群众路线方法的第一个总结，是迄今为止的最高总结。但坦率地说，回顾近50年后，毛泽东和其他人已经澄清和详述了许多观点，那篇论文本身已经不能被认为是群众路线理论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例如，这篇论文并没有充分解释"集中"和"系统化"群众的观点是什么意思。马克思主义在此中的作用并没有被讨论（尽管毛泽东在后来的著作中已经充分明确了这一点）。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到：群众路线的理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的结果。一些资产阶级作家声称，群众路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之前，例如中国苏维埃共和国时期（1931-1934年），甚至更早[13]。这里的混淆来自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延安之前就使用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但是列宁和马克思在更早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段时间，毛泽东也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一样，或多或少地无意识地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方法。但是只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才开始科学地总结这种实践背后的理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毛泽东明显将群众路线归功于列宁。我已经把毛泽东称为群众路线的创始人；但毛泽东自己经常似乎把这个荣誉归功于列宁，如下面的三个例子：

**我们扩大了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依赖群众…[14]**

**我们遵循列宁的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15]**

**我们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十月革命中学习。马克思留给我们很多著作，列宁也是。依赖群众，遵循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16]**

然而，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谈到"我们的群众路线"等等；他把群众路线说成是中国革命的发展。[17]此外，中国共产党和其成员经常把群众路线归功于毛泽东。[18]对于这个"悖论"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列宁确实使用了群众路线，并在许多场合提到了群众的创造能力和群众路线理论的其他方面，毛泽东无疑从这里以及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学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毛泽东可能至少部分地从列宁那里"学到"了群众路线的方法。然而，是毛泽东总结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对它进行了评论和详细阐述，并成为了群众路线的主要理论家。因此，无论毛泽东说了什么，把群众路线的理论归功于他是唯一明智的。

我在上面指出，在他早期对群众路线方法的描述中，毛泽东并没有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本身。相反，他把它称为"把领导与群众结合起来的方法"或"把领导集团与群众联系起来的方法"。它经常被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关于我们党历史上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

说的那样。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群众路线’这个词才开始出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或者至少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他的选集中），尽管它从一开始就被当作一个熟悉的老词，显然已经在口头上广泛使用。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这种方法的惯用名词一直是‘群众路线’，尽管旧的名称也一直在使用，特别是在中国。当然，对于这个词‘群众路线’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观念。例如，我认识的一些共产党人并没有把群众路线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相提并论（参见第 40-41 章）。

延安时期之后，毛泽东继续发展群众路线的理论。例如，他用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一个工厂处理原材料成为成品的整个过程，来阐明集中群众思想的过程。但最重要的是，他反对不断出现的右派解释，比如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观点，即群众路线意味着“按照群众的意愿去做一切事情”。[19] 比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对群众路线的误解更糟糕的是，由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提倡的邪恶的官僚、修正主义的解释。他们对群众路线的歪曲将在第 37 章中讨论；现在我只是指出，毛泽东发动的针对这些修正主义者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了群众的主动性和群众路线，这并非巧合。

反对右派对群众路线的歪曲实际上是发展群众路线理论的一种方式，是澄清群众路线真正含义的一种方式。因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群众路线的阐述的贡献不应该被低估，仅仅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没有写出一篇长篇论文。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时间和地点，因为群众路线的理论早已不再是中国独有的关注点。随着它的传播到其他国家，也就有了必要在那些国家内部反对对它的歪曲和误解。在美国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将在第 40 章中探讨，即鲍勃·阿瓦基安（Bob Avakian）和革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作为革命工具的防御。

因此，群众路线绝不是死教条。没有理由相信群众路线的理论是“完整的”，或者“澄清的”，或者“一劳永逸的”。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活生生、不断成长的东西，这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较年轻的部分，如群众路线这样的领导方法的理论。只要阶级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有部分都必须得到捍卫，因此必须进一步澄清，就像它需要不断地通过进一步总结革命实践来增强一样。

作者注：

[1] 引自阿兰·布克（Alain Bouc）的《毛泽东：他的思想指南》（纽约：圣马丁出版社（St. Martin's）出版社，1977 年）。

[2] 引自劳伦斯·J·彼得 (Laurence J. Peter) 的《彼得的引语》(纽约: 班塔姆书社 (Bantam), 1979年), 第260页。

[3] 埃里克·福纳 (Eric Foner), 《汤姆·佩恩与革命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6年), 第79-80页。[4] 同上, 第79页。[5] 同上, 第82-3页。

[6] 德尔克·J·斯特鲁克 (Dirk J. Struik),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纽约: 国际出版社, 1971年), 第12页。

[7] 毛泽东, 《语录》“在山西绥远日报编辑部的谈话”(1948年4月2日)。

[8] 斯图尔特·施拉姆 (Stuart Schram) 指出, “与‘群众路线’相对应的观念和方法开始在毛泽东的作品中出现”, 这发生在1927-1936年期间, “尽管这个概念只在随后的十年里被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思想》(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9年), 第9页。] Schram 将群众路线视为“延安遗产”的一部分, 甚至是核心部分。[同上, 第86页。]

[9] 参见 Stuart Schram, 《毛泽东的思想》(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9年), 第98页。

[10] 毛泽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SW 3:87。

[11] 毛泽东, 《大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 《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49, 1972年1月/3月。

[12] 爱德华·汉蒙德 (Edward Hammond), 《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路线》, 现代中国 (Modern China), 第4卷, #1, 1978年1月, 第4页。

[13] 例如, Marcia R. Ristaino 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她说“最早的共产主义群众路线的实践是在研究期间 (即1927-1928年) 在中国开始的”。[《中国的革命艺术: 1927年和1928年的不满情绪的动员》(达勒姆: 杜克大学出版社, 1987年), 第2页。] 如果 Ristaino 的意思是最早的对群众路线详细理论的有意识的实践, 那么这是错误的, 因为这直到延安时期才发生。如果 Ristaino 的意思是最早的无意识的, 或者半意识的, 群众路线的实践, 那么这也是错误的, 因为这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只有当 Ristaino 的意思是在中国最早的无意识的群众路线方法的实践, 她才是正确的。但是, 这几乎不是一个启示; 这正是毛泽东在1948年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群众工作时所指出的。(参见上面的注释7。)

[14] 毛泽东,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 MMTT, 第106页。

[15] 毛泽东, 《在八届二中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 MMTT, 第121页。

[16]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SW 5:342。

[17] 参见例如, 毛泽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 约1960年, 《苏联经济学批判》(纽约: MR出版社, 1977年), 第119页。

[18] 参见例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 转载于 K. H. Fan 编, 《中国文化大革命: 选定文件》(纽约: Grove出版社, 1968年), 第173页; 以及, 田志松,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北京周报》, #29, 1972年7月21日, 第11页。

[19] 毛泽东,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2月11日)。

# 我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什么工作？

★ 丧钟 统一战线

我们路线应该是怎样的呢？

就是倡导我国一切优秀的和有条件的革命分子去工厂融工，发展工人工作，逐步的建立起由工人革命分子主要构成的工人革命组织和包括广泛工人的群众组织（或者说工会组织）。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国工人运动就能继续发展，并且也会开始转为政治斗争。如果不把工人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且逃避现有的斗争（哪怕是经济斗争）那么就一定改变不了现状。我们只有利用、发展现有的一切工人斗争，并且组织工人，我们才能把使工人阶级逐步的组织起来、革命化，才能在发展起我国革命的同时成为我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 一. 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现状和我们的主要任务

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工业国，首要要明确的就是我国革命发展主要依靠无产阶级，

又特别是工人阶级。因此判断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现状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工人运动现状、革命运动现状以及两者的关系。而我国工人的基本现状，我们曾在《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等文章中具体指出过，并引用过专门的数据分析。

当然一年的数据不足够说明，我们再把眼光放长远几年来统计。从2015年1月1日到2023年5月12日，8年内共发生了12940起能统计到的工人运动，平均每天发生4起以上。

.....

在这八年所有工人运动的诉求中，欠薪讨薪类的运动就占10343起，占比79.93%。其他的原因诸如加班、社保公积金、迁厂关厂、经济补偿金、裁员、社保等等加起来也只占20.07%。无论怎么看，我国现在阶级斗争的性质都是经济斗争，还没有政治斗争的一点点地位。

——革社第三期刊物《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

只需要看看这些基于现实斗争的一般统计就能明白，至今我国工人运动还是纯粹的经济斗争。

并且但从我国工人阶级斗争规模上来看，我们今天的工人运动程度只有0.17%，就算夸张一倍也只有0.34%，只有列宁1895年时期创建“工人阶级解

放斗争协会”时期的俄国工人运动七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参考值为1.2%）。

那么我国革命运动现状及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关系的两个方面呢？我们也曾说明过。

列宁利用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首先是俄国比较充分发展的工人运动，“1895—1899这五年内参与罢工的工人数达到了22.1万，约占俄国这个时期工人总规模的6%，平均五年每年参与罢工的工人约占全体工人总数的1.2%。”而我们情况是这样的。

……

列宁利用第二个条件就是即有的组织，首先是即有的工人组织。从工人运动的质量上来说，我国工人有组织的进行斗争的现象还是非常少的，要求建立自己的斗争组织、工会等形式的机关的要求还是非常罕见的，虽然早在类似2010年的本田罢工中，工人们就提出了要求重组工会的目标，但这种现象还是少得可怜的，至少少数的这种尝试最后又失败了或组织瓦解了；并且我们可以在2022年的富士康工人运动事件中就可以看到，他们还没有形成类似意识，更没有构成“南俄工人协会”、“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样的组织。所以就有组织的罢工这一点上，我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自觉性还是不够高的，甚至还没有较普遍的达到有组织的进行经济斗争的程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直接像列宁那样利用工人自己的斗争性组织来建立与革命分子相结合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组织的那种条件还是普遍没有的。此外列宁还利用上了本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的条件，早在此前的普列汉诺夫就创办了“劳动解放社”，按我们的定义，这种组织大部分具有了革命组织的性质而不主要是左派组织，并且这些组织还普遍的是线下组织的形式。列宁利用这些本地的组织，把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集中了起来和工人组织结合了起来。很可惜，就这样的条件，我国目前也还是比较缺乏的，谁都知道目前很多墙外组织还大多沉迷于线上工作中，我国大部分左翼组织还是线上组织形式的。如果仅仅只是一个线上组织，那么它始终只能是某种程度的手工业小组。当然，我们自然不是说线上工作不重要，而是说线下的工作也是我们今天进行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线下工作的充足发展，那么构成真正的党的基础的群众工作就不可能实现。……

- 革社第八期刊物《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因此简单来说，我国革命运动的现状是工人运动的不发展和革命运动的不发展，以及革命运动尚未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运动的不发展体现在斗争的纯粹经济性质、工人整体参与斗争的比例低、斗争组织的缺乏；革命运动的不发展主要体现在我国革命分子普遍的远离工人工作，或者说工人工作还不是我国革命分子们的主要工作；而未结合则体现在缺乏大量的工人阶级革命分子，缺乏把工人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结合起来的力量，也缺乏在这种基础上的政治活动。这些是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事实，这个事实之前已有一些左派分不清楚，现在东风也不承认。

比如他们在文章中这样胡诌道：

至于革社说“根本就还没有到在各地（至少是主要工业区）已经展开了一定组织工作的阶段”其实不属实，尽管彼此之间是很分散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展融工的短则两三年，

长则十几年，不知道不代表他们不做。比如，之前佳士事件中有个不那么出名的同志，也是长期融工的人，后来过世了，但是没几个知道。他们其实一直奋战在融工第一线，但是孤立无援。这位同志因病离世前说：“我们以后也不会被人知道，我们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了。”革社因为自己脱离群众，因而想去扩大组织，不惜否定之前的左派同志的斗争的前赴后继。麻烦各位研究生们，哪怕在墙内网左间混一混都知道，已经有很多融工的同志早就进入工厂了！当然了，他们看不见自然就没有了，我替王阳明点个赞——“你未看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首先这里就混淆了两个地方，首先把一定的工人组织工作和融工、进入工厂的活动混淆起来，仿佛左派只要进入了工厂就算完成了一定的工人组织工作，如果这样打工也算融工，这种融工自然也算组织工人。第二，在于把个别情况当成了普遍情况，左派进入工厂融工至今仍然是非常少数的现象，东风称墙内有很多融工者，如果是从比例来说的话，是绝对错误的，是不和实际相符合的，墙内现在一些左派组织如“燎原”，以前的有如“RC”、“中国人学习群”等等都不是进行融工的组织，在这些地方也看不到几个融工者，直到现在墙内也普遍是这样；但如果不从比例出发，只是说墙内有许多融工者，那么几十、几百、几千个也都能算很多，按照东风自己的观点都是有可能称得上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拿出切实数据，但如果不从比例出发就判断墙内很多融工者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持有东风这样的观点，那么我们的全部工作重点则依然还不能是融工工作。

既然东风认不清事实或者说故意选择了罔顾事实，那他们就不可能从我国革命的基本情况出发来制定路线。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尚未结合的基本现状恰恰主要需要一种手段来解决，那就是融工。因为要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它就绝不能是一般的融工，而是一种有较高的客观历史需要的艰巨任务。这种融工完全不是东风所理解的那种融工，它不是去工厂里打工、不是在工厂自发组织工作的融工、也不是做受线上绝对领导着组织工作的融工。这种融工要求从三个基本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因此这种融工需要完成这样三种具体的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质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要发展我国革命就非得完成这样的工作不可，所以这样的工作已经不再是什么次要的或什么组织的附属工作了，它要求现有的革命力量为它服务。而要这样历史使命就需要完成这样具体的工作：发展出和组织起大量工人革命分子，广泛的组织起一般工人，发展和组织工人斗争（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最终是革命）。

## 二. 政治报工作的问题

对我国革命的发展有错误判断另外一种代表便是政治报工作的特别推崇者或提倡者，现在的东风（以前还不是这样）、现在的《前进报》、列宁道路（之前提到过）、新十月（之前谈到过）等组织，以前的米宁等人也尝试过。如果只是一般的谈需要作一些政治报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旦有人开始以各种方式（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实际上的）否定和阻碍融工工作，或者否定融工工作的首要性而把政治报当作首要工作的时候，他就实际上的倒退到非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革社曾在八期刊物《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中提出过实质建党。我们的路线很明确，我们认为目前主要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和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础来完成实质建党。我们不是不要全国政治报，革社的刊物就是就是一种政治报，当然它还不是全国政治报，它的受众还不多、其他方面还有待改进，但我们认为这个工作目前是次要的，发展工人工作才是主要的。因此工人工作和政治报工作是目前发展我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工作中对立统一两个方面，其中工人工作是主要的方面。

因此，列宁道路的《融工很重要，但它不等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篇文章，从标题内容来理解是有道理的，但有道理的理解只能把它理解为需要一种和过去不同的融工，政治报在这里起次要的辅助作用。本文同时强调两者，但根本没有分清主次，起到了调和的作用，这就为知识分子式的机会主义路线打开了闸门。

因此，彻底知识分子式的机会主义路线便出现了，《前进报》的《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便是代表，他们说自己和列宁道路完全一致，但他们实际上还倒退了好几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单从标题和基本内容来看，政治报已经成为了他们要进行实质建党工作的主要方面，而以我国初级的革命活动现状来看，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才是这些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些活动也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扯不上关系的，因此现在谈实质建党是靠政治报，等于说实质建党是靠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

他们只记得列宁曾经办过政治报，但恰恰又忽视了列宁曾经创办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解放协会和种种工人组织、工人运动的作用。他们自以为完整的看待的事物，把两个方面谈了一下，然后又立马再一次实际事物割裂了开来，错误的判断主次。他们默认一切融工工作必然是经济主义的，离开他们的政治报就什么无法实现政治灌输等等，但他们又恰恰忘记了政治的灌输是需要具体的革命分子去实现的，政治报离开他们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此政治灌输首先是由融工者来保证而不是由政治报保证，政治报在这里是第二性的，错误的理

解这个主次关系就必然导致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他们是这样阐述自己的计划的：

因此，不是“线上服从线下”、“一切先进分子都到工人中去”，而是全部工作“服从革命需要”，全部工作统一由地方核心小组领导安排。对于地方革命小组，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自然是尝试建立工人小组。但成熟的革命组织不是没头没脑地向困难冲锋就行，

它还要会安排自己的预备队，即按旧有路径继续培养新生革命力量；它还要继续培养革命者，不能放松组织内部任一成员的学习活动，因为良好的理论修养是一切之基；它还要作为独立组织，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并据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判断，要关注其他小组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理论斗争。在上述这些方面，都需要有觉悟高、组织能力强、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来领导乃至承担最困难的实际工作。甚至可以说，在初期工作小组不大的时候，最优秀最觉悟的同志，不应是大部分去融工，而应负责融工以外的工作。

就进行政治灌输、建立工人小组的任务来说，也应当是厂内外同志的分工协作，单讲“融工”是不足够的。知识分子融入工人或者进厂，只不过是提供了接触工人的上好机会。而政治教育不同于平日的随意聊天，是需要工人腾出大块完整时间以接受大量新知识，并频繁思考的活动。这种活动完全可以不用进厂的同志参加，并且应该不让进厂同志过多操心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内容上考虑结合时事热点准备材料，事务上如寻找场地等。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进厂同志只负责将人领到“工人夜校”处即可。

我们说这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路线，是实际上抛弃无产阶级的路线。既然“线上不能服从线下”，不能号召“一切先进分子到工人中去”，那就一定要由其他非工人的来构成的组织和不能明确主要服务工人革命利益的地方小组来把控工人事业，这就实际等于是说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一定要照顾这些其他非工人的利益，我国革命运动不能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这是赤裸裸的叛变！至于理论学习、厂内厂外的分工合作等等都是次要的技术性问题，

用次要的技术性问题来模糊问题本质也是本文的特征。

拒绝我国革命要彻底的往工人阶级发展，拒绝工人革命力量的领导，而是错误的把全国政治报当作工作重点，丝毫不重视通过正确的融工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广泛结合起来的工作。这完全是知识分子的立场。那么这条路线究竟要建立出一个什么样的党呢？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式的党或知识分子领导的党，也就说要么是翻版的中毛共式的党、中革共式党，这是名义建党，要么实质建立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或私人资产阶级的党。而我们提出实质建党是工人主要构成阶级并以工人阶级的精神和阶级利益领导着的党。

前进报本文的问题还有很多，这篇文章中把一大堆他们自己硬造的靶子塞给我们的。我们从来也不反对政治报和工人工作同时做，但我们一直要求分清主次；并且我们讲的融工从来是有具体内容的（为此我们曾专门写文和大群、

新十月争论过很多次)，但他们在本文中以批片面的融工的方式来批我们，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那么我们路线应该是怎样的呢？就是倡导我国一切优秀的和有条件的革命分子去工厂融工，

发展工人工作，逐步的建立起由工人革命分子主要构成的工人革命组织和包括广泛工人的群众组织（或者说工会组织）。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国工人运动就能继续发展，并且也会开始转为政治斗争，如果忽视工人工作的首要性和逃避现有的斗争（哪怕是经济斗争）那么就一定改变不了现状。我们只有利用、发展现有的一切工人斗争和组织工人的同时，我们才能把使工人阶级逐步的组织起来、革命化，才能在发展起我国革命的同时成为我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前进报》只是企图把我们往后拉：

*“融工”只是片面地强调了知识分子要进工厂与工人接触，但这只是一种创造工作基础的条件，不代表能必然导向好的工作结果（与工人接触不代表能做好政治灌输），即建立工人小组。后者需要的是在革命地方小组统筹下，切实地、自觉地、有计划地从事工作。这也是过去革命历史传承下来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前身的地方小组的工作方式，口号应当是“建立巩固的地方小组”，应当向整个左翼介绍地方小组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

*创造新的口号，如“融工”或者“线上服务线下”的工作原则，是不必要的。对于大多数理论修养不足、对过去经验了解不够，但又愿意付诸实践的革命左翼来说，这会扰乱视线，*

*让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去“与工人结合”，忽视了建设稳固的组织，其结果可能是，理论水平不足，计划做得不好，使得政治灌输效果较差，而后迟滞的工作进度又加剧了组织的涣散。*

**既然不能有工人革命事业的决心，也没有进行工人革命事业的打算，那么他们自然完成不了工人革命的事业，他们因此就否定工人革命事业的路线，用各种次要问题和特别理由来抹杀这个问题核心，实际上的阻碍我国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

因此争议已经变成了这样：围绕着实质建党核心争议的两个方面，即融工为主路线和政治报为主路线开始发展为了不能妥协的路线斗争，是完全不同的阶级立场的相互斗争，是要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方面的利益还是无产阶级方面的利益。是主要靠政治报的实质建党和统一，还是靠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 and 工人阶级的领导为基础的实质建党和统一；主要靠政治报式统一那就是东风式的统一、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式的统一，而靠工人革命事业和工人阶级领导为基础的统一。

我们应该用他们原话回敬他们自己：

*由此看来，我们不是读列宁读得多了，而是读得少了，并且读得很粗疏、不求甚解，以至于不是领会了革命的精神，而是领会了革命的教条。我们发表本文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各地*

的左翼小组能够结合实际而非教条地、实质上而非形式上地领悟到列宁主义政治报建党路线精神，把革命导师的丰富经验运用到革命工作中去，把革命工作推回到对革命事业最有利的道路上来。

《前进报》的文章让我们清楚地认识了他们的阶级立场，虽然他们还是不自觉地，但现在却实际的阻碍着工人成为下一个阶段我国革命运动主要的和领导的力量，我们决不可能去追求这种统一，这是机会主义的统一。就算他们想办报，我们也要号召一切我国真正的革命派不要和他们去办。我国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走到以工人革命事业和工人领导为基础的革命路线上，目前需要用正确的融工工作来主要推动我国无产阶级的实质建党事业。



# 谣言破除——列宁因为梅毒去世

★ 州莱

今年的1月21日是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同志逝世的第一百周年，作为20世纪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列宁同志领导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即便死去的人物，资产阶级也乐于编造一系列谣言，试图将为无产阶级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物污名化，将一些根本子虚乌有的事情炮制出来，目的就是为妖魔化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事业。

本次破除的谣言为：列宁因为梅毒去世。

列宁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个谣言最开始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根据笔者的查阅资料显示，目前比较广泛的流传版本是21世纪初期，三位以色列的专家在一篇名为《欧洲神经学》上的期刊发文称：列宁死于神经性梅毒。他们给出的证据是列宁生前所治疗的药物中有一个叫做“阿斯凡纳明”的药物，这个药物一般来说是用来治疗梅毒的。我们先不去较真为何会使用治疗梅毒的药，众所周知，列宁在1918年遭遇了刺杀。而后列宁的身体情况就每况愈下。由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子弹留在他的颈部，靠脊柱很近，约1cm，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安全取走子弹。直到1922年4月24日，由一位德国医生为列宁实施手术取出了子弹。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右侧部分瘫痪，同年12月第二次发生中风后，他停止政治活动。在1923年3月，他第三次中风后，直到去世一直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



1923年列宁再次中风

根据笔者查到的资料显示，瘫痪和无力症状都是神经性梅毒的症状，但巧合的是中风的症状也和此类同。就因为列宁被开出了治疗梅毒的药就断定列宁患了梅毒是否是有失偏颇的呢？笔者不甚了解医学，但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前文所提到的阿斯凡纳明，为后来的青霉素的使用奠定了基础，大家能理解什么意思吗？在当时那个年代，抗生素的作用有多么重要，在当时抗生素即为“神药”，治疗团队为列宁使用这种药物尝试救治，就能断定列宁罹患梅毒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况且还有一个证据能够指出列宁并不是因为神经性梅毒去世的，在1925年，苏联政府邀请德国神经学专家解剖列宁的大脑，并没有发现有梅毒螺旋体病毒的感染迹象。这就足以证明所谓因为神经性梅毒去世的言论纯属是无稽之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篇具有非常政治色彩在的文章，书中还捏造了斯大林如何阴谋夺权的内容。在2012年，美国历史临床病理协会 ((Historical Clinicopathological Conference) 名人死因诊断理学教授哈里·温特斯博士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夫·卢里两人认为，列宁的死因是精神压力、家族病史甚至中毒，而不是此前盛传的死于梅毒，也不仅仅是中风这单一的原因。

事情到这里也应该告一段落，正如前文所说，列宁的病症属于多方面的，在那个年代，医学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病急乱投医的现象是一定会存在的，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要使用阿斯凡纳明这样的药物了，因为病症确实是很相似的。

但本着求实的态度，我们来理性分析列宁到底是为什么去世的。

官方给出列宁的死因是血管壁硬化，也就是动脉硬化，经过解剖，列宁的大脑状况很糟糕，脑颅组织总共只有1340克，连平均的脑重量都达不到。不仅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关于列宁死因最权威的资料还是应当属于列宁生前的主治医师著名神经科专家维·奥西波夫。奥西波夫在《列宁的疾病与死亡》中写道：列宁最后死于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这与前文中的解剖结果符合。这个病症是列宁家族的遗传病，列宁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在50多岁左右去世的，死因也是突发的脑血管疾病，尸检报告表明他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这些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因素。但是死后对他的解剖发现：他的脑血管“就如石头一样硬”，脑动脉用钳子敲时听起来就像是敲石头。历史临床病理协会此次会议的组织者菲利普·马科维亚克博士说，作为不到54岁的患者而言，脑血管硬化到这种程度令人难以理解。尽管性病会导致中风，但是解剖结果表明列宁并非这种情况。所以列宁的死因是什么大家都应该能够明确了。

事实上，带有政治色彩的谣言并不少见，而这往往又要与“性丑闻”扯上

关系，正所谓文章为政治服务。远的不说，就说我国诸如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种文章，至今还被自由派奉为圭臬，他们在革命低潮期，就疯狂污蔑革命，骂他为“穷人的暴动”“泥腿子造反”“想翻天”而在革命高潮中就混入革命，例如十月革命中的季米涅夫，不仅不支持武装起义，还破坏革命，把革命的计划发到报纸上，泄露组织机密。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愤怒的说他是工贼，并请求开除出党。因为立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他们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对造谣革命的反动派，他们是反动派说什么他信什么。公社同志们写谣言破除系列的文章就是为了彻底扫清反动派按在同志们身上的谣言，肃清他们的流毒，树立马列毛主义正确观念。

自由派乐此不疲的用旧道德去批判前人，只不过利用了当前群众对旧道德的服从。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列宁真的感染了梅毒，但也丝毫不影响他是无产阶级运动中伟大的革命家，自由派应该去思考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能让列宁染上梅毒，为何一个简单的性传染病能困扰资本主义世界如此之久。与之相对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1949年刚建国时，中国正处在梅毒传染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期：当时在一些大城市每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有梅毒。相当于5%的发病率。当时在农村地区的梅毒病发率是2-3%。1952年，大规模诊断苍白螺旋体病毒，为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并且关闭了妓院。到60年代，大规模扫除梅毒行动有了卓越成效。1964年，时任中央皮肤性病所所长的胡传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一文，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梅毒。而随着所谓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的性传染病的数据多么触目惊心也就不再赘述了。

话已至此，其实面对这些略显可笑的谣言，我们更多的时候应该转向对旧道德的批判，不然终归会落入自由派的圈套，疲于应付自由派的指责，没完没了。而这种对旧道德体系的批判，由于无法在主流渠道上实现，所以要在平时切实的线下工作、群众工作中实现。

# 宁陵县的斗争

★ 丧钟

宁陵县斗争的结局虽然失败了，但群众用自己的斗争证明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是牢不可摧的，他们对群众害人的剥削、压迫并不是不能被消除的，群众们完全应该也有能够用组织起来的斗争解放自己。同时这场斗争也不厌其烦的再一次向我们指出了：我国广泛的群众运动依然没有和马列毛主义结合起来、运动缺乏组织性和自觉性，群众中依然缺乏革命分子的优秀工作，群众运动缺乏革命工人的领导；我国的人民斗争还需要更进一步，我们应该吸取斗争的经验并积极的为将来的人民斗争服务。

2023年12月24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育华园学校的一名中学生被发现死在教学楼中，校方称学生是自杀身亡，县政府也出面证明学生是跳楼自杀。但死者家属并不认可，他们指出了种种疑点和非正常死亡的证据，并带领其他群众进行斗争。对于这个学生的死亡，有上万名当地民众到现场献花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与对家属的支持，对政府和学校提出质疑与抗议。

政府第一时间调遣了当地的警察来驱散和镇压群众。但愤怒群众并没有放弃斗争，他们通过激烈的斗争赶走了警察，并一度冲入学校砸毁了学校的办公室，他们殴打了副校长、并要求他跪在群众面前。抗议的民众还包围冲进了县政府大楼，他们高喊“杀人偿命”，并迫使宁陵县县长出面与群众交涉。但政府同时也从其他地方调来了大批特警，他们封锁涉事区域与多条道路，在关键路口用车辆横摆封路，并大量抓捕积极运动的群众。事情结果是官方依然维持了原有的判断，虽然他们声称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组，但调查结果依然是自杀，唯一的妥协就是认为“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够”并为此假惺惺的道了个歉。

## 一. 专制的声音和群众斗争

死者家属表示，他们早上6点被通知学生出事，但在当天下午3点才见到其遗体，遗体上有多处伤痕，不仅手被螺丝刀钻洞、脚踝也被扭断，因此怀疑校方拖延他们看到遗体的时间，目的是在掩盖真相。此外，家属怀疑学生可能

在23日就被害，因为死者隔壁班的学生在前一晚被告知不能回宿舍，导致这些学生在教室趴睡了一个晚上。学生家属要求校方提供案发时的监控录像，但被校方拒绝。宁陵县政府则在27日发公告称，死者是因个人原因跳楼自杀，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家属和群众要求给出真相和惩办凶手，而校方和地方政府则完全不承认这一回事，甚至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情况就变成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家属和群众一定要战胜学校和地方政府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学校和地方政府则必要继续侵犯群众利益才能够维护已有的利益。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发出了不容群众反对的声音，甚至不惜用暴力来维护，这就是专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但专制必然引起群众的斗争，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和每一个群众利益相冲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死者的爷爷奶奶父母等亲属在学校门口摆放死者的遗像和遗体照片，以及写有“还我孩子”字样的横幅，并高喊“学校老师杀死学生”等口号，而大批当地居民到现场献花，民众一度 and 警察发生冲突。

这说明，当群众的共同利益遭到损害时，哪怕是一个人的不幸也能引起所有群众的斗争。河南不缺这样仇视专制和现存社会的群众，全中国自然更不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各地陆续有民众前往商丘市声援死者 and 家属。据了解，12月28日起，当局一度以大雾为由，关闭所有高速公路的出口，避免外来车辆进入市内。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警惕群众力量的扩大和组织化，他们及时做了隔离措施，的确起了一定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白小姐说：“河南本地的，周边的，还有山东的好多人响应号召声援小孩的父母。大家都开车到那儿去。当局以大雾为借口直接把高速路的闸口闸住。县城是只出不进。接孩子的人要拿出身份证。一般来说，高速公路必须能见度不足50米才封路。昨天是完全能看清楚的。”

——《时事大家谈》

单从这一件事情中我们就能发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群众和群众斗争有自发联合起来的趋势、并且这种的联合起来的潜力是无穷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自发的、缺乏组织的群众斗争还不能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做有效的斗争，斗争是涣散的，无法积极的做正确的、有效的、统一的战术行动。但这种不足，单靠群众的自发运动本身是无法克服的，它需要由一批出色的运动家把群众们组织起来行动，而要保证这种行动能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的话，它就必须要由工人阶级先进部队来进行先锋队式的领导。

在一切群众运动中，资产阶级总是利用宣传机关来做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宣

传，以使群众运动不至于迅速扩大和联系起来，在很多时候的确起到了帮助，越是在群众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的时候这种“帮助”就越大。因此，我们也需要和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关作斗争，需要更多调查、揭露、鼓动，才能更好的使群众更多的参与运动。因此，整个宁陵事件中，关于宣传的斗争也是没有停息的：

邢鉴说：“种种迹象都显示，这孩子生前遭到暴力殴打，而不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官方回避事实，然后把事件定性为‘自然死亡’，以逃避刑事责任。民众（强烈回响）是基于对孩子的同情，也是基于社会责任感。今天我不站出来，明天我就站不出来了。大家心中积累了一种愤怒。”

上传到互联网的视频引述疑似该校学生讲述事情经过，认为死者可能是23日凌晨在厕所里遇害，其后校方从楼上把遗体扔下楼。有学生更声称，该校校长有份参与。

有自称死者亲戚的网友表示，学校宿舍两边的窗户都是封死的，死者根本无法在宿舍跳楼。而早在去年，该校就有学生遭到老师体罚。老师还让其他学生轮流打人。

基于安全考量化名白女士的河南居民确信这起事件另有内情。

白女士说：“当地学校的学生回家跟家长说，是老师把这个小孩拉到小厕所打。打得不像样子之后，强行让孩子在厕所里一直躺着，快不行的时候从楼上扔下去。隔壁村有网友跟我说。这学校有很强的保护伞。100%是官商勾结，能开办学校的肯定有很强大的保护伞。”

——《时事大家谈》

在宁陵事件中，已经产生了鲜明的宣传斗争，一方面官方利用国家机器和宣传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有利于他们的宣传。而对立的另外一方，有人在油管上做了关于《宁陵事件》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较好叙述了整个运动的过程；除此之外，一些自由派媒体也一直在做揭露的工作，这些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了事情。但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宣传斗争的力量还是很不足的，自由派的零星声音和群众自发的宣传是完全没有力量战胜资产阶级专制的全国机器的，并且这种宣传斗争还缺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中的自觉组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舆论压制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官方宣传确实唬住一些不了解情况的群众。这些群众根本没有了解事实和参与斗争经常的有力渠道。

## 二. 运动的过程

运动基本从大规模群众参与的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扩大化了起来，受害者

家属拿着孩子的尸体照片在学校门口演讲，大批群众参与了进来，要求学校放出监控录像、公布真相。27日有数千人，而28日学校门口已有上万人。

学校拒绝了群众的要求，部分学校领导在大批特级的保护下欲离开现场，虽然车辆轮胎被群众放了气，群众也根据自己的大部队对警察群体进行了缓慢的追赶，有零星的极少数勇敢群众试图冲了进去，但被警察拦住。因此，由于没有足够多和足够有勇气、有力量的人带头迅速冲击并抓捕试图逃跑的校领导，大部分群众自身也难以更有力、更激进的去行动，且由于缺乏有力的组织，所以最后放跑了两位校领导。故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群众的取得的胜利并不算太大。

随后，群众分为了两路，一路在在受害者家属爷爷奶奶的带领下前往了县政府，另一路则在学校门口继续抗议。

死者的爷爷奶奶在一辆三轮车上缓慢的带着庞大的群众队伍朝县政府前进，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而当地政府则调动了当地包括交警在内的一切精力试图拦截这支队伍。最终群众在县政府大门和大量警察形成了对峙，群众推倒了县政府的电动门。其中有一名中年人站在被推倒的大门上演讲，后也有一名老人在警察和群众对峙的前端拿着扩音器演讲得到了更多的群众的支持。老人是这样演讲的：

“你（指警察）都不站一边，老百姓都得过去（指警察拦路）。老百姓都得过去！就这活活的一个孩子被打死了，你说人家跳楼。你都没有儿女，你都不怕报应？你都不怕你的孩子到时候走到这一步？千家万户的小孩，千万别送他去住宿（指小孩在校被打死）。你这样对待人家，你可是良心被狗吃了。”

之后，群众们攻入了县政府，警察的阻拦失败。大量群众走到县政府大楼，有人称“抓领导”。部分警察动武但失败，群众逼迫了县长出面讲话。见县长出来讲话，表好态度，部分群众克制住了情绪。但县长讲话只是一个缓兵之计，随后更多的警察被调了过来，并且这些警察普遍装备了防爆盾和警棍，他们直接开始殴打群众、有的向群众喷洒了辣椒水，还抓捕了少数群众到大巴中去。群众包围大巴试图救人，并和保护大巴的警察发生了冲突斗殴。但由于群众缺乏有力的武装和精锐部队带领，参与斗殴的群众相对较少，而且少数群众的个人进攻能力相对警察的防御能力显得较弱。最后，包围县政府的群众完全没有达到运动目的。

而另外一方面，包围学校的群众攻入了学校。在举着国旗的网友的带领下，大批群众冲进了学校，学校的安保力量明显弱于县政府，这里的警察也普遍缺乏装备武器，并且这里的带头群众更加激进。他们带头砸毁了学校的部分设施，

直接冲入了教学楼，最后抓捕了还未逃走副校长，在一名中年妇女和中年男士的牵扯下，副校长被拉到人群中被殴打，最后被迫给群众下跪。而校长则趁机逃跑，不知所踪。但运动就此结束，群众在殴打过副校长后放走了副校长。但此时，大批警力已经到达学校，群众于是开始停止进一步的运动。因此，包围学校的群众虽然顺利的占领了学校，但没有成功抓到校长。并且由于整个运动的目的不明确，没有提出代表群众利益的诉求让学校领导承认，因此运动没有争取到更多的实际成果。

28日下午，大量外地警力开始调往宁陵县，县政府和学校得到了更多警力的保护。运动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此时仍有大量群众没有撤离，武力对比开始不平衡，此时情况已经不利于进行激烈冲突。当天晚上，当地所有群众收到短信，要求当地所有群众在29日不得前往县政府和学校。29日整个县城开始戒严，所有前往县政府和学校道路被控制，外地车辆也被拦住。至此，宁陵县的运动基本落入尾声，而新的官方调查公告更是确定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本次斗争中的胜利，他们选择完全扭曲事实。

### 三. 总结

#### A. 在宣传方面：

1.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机器和宣传机关，群众运动的扩大、发展和全国联系被大大削弱。

2. 反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宣传斗争还是自发的、分散的、缺乏组织性的、没有正确政治路线的，这种程度的斗争还无法战胜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关。

3. 由于这些情况，我国更多群众根本没有了解事实和参与斗争经常的有力渠道。

#### B. 运动方面：

1. 仍然是自发的斗争，仍然缺乏组织。

宁陵县斗争的优点在于比过去的群众自发斗争有了更多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大量的群众参与了这个联系着他们集体命运的个人不幸的斗争，并且自发的组成了游行队伍和警察进行斗争。但总的来说，运动本质上还是自发的，运动也缺乏组织。在运动不可避免的扩大情况下，攻入县政府和学校的群众都没有提出明确的、有群众利益代表性的诉求。部分群众在抓到副校长后没有提出明确的代表集体利益的诉求，一些群众在见到县长或者被迫离开县政府后也没

有提出来。由于没有明确代表集体利益的集体诉求，没有明确组织起来分工对抗警察，因此像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到最后大规模警力进入后，群众也没组织起较好的撤退和反抗，最重要的是没有保护好家属（导致前几天异常活跃的家属现在转换了口风，应该是被威胁了。应该有人日夜不停的保护家属这种具体斗争中的重要部分），导致也失去了今后继续进行斗争的一个有利手段和条件。

因此，我们应该组织起群众，使群众能够以明确的政治路线、斗争计划、斗争策略来进行各种具体的斗争，并且使这个斗争带有自觉性，充分根据敌我情况采取斗争战术。而由于要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组织只能是由进步工人进行领导，由他们对整个群众进行先锋队式的组织，并在各个具体的斗争中立即选出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共同负责组织运动，使整个运动由积极斗争的群众和革命的进步工人直接负责带队。

## 2. 缺乏少数勇敢的精锐部队带头冲锋进行最艰难的斗争任务。

除了第一点以外。从最开始拦截校领导失败，到后来没能救出被捕走的群众的一系列斗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群众并不是彻底害怕了斗争，而是缺乏有勇敢的精锐部队带头打击；因而在攻入学校的具体斗争中，由于有人赶带头抓捕副校长，其他激奋的群众得到了更大的鼓舞。因此，今后一定要培养起一支敢于带领群众进行最艰难斗争的同志，这种队伍要有纪律和组织性、要有斗争的勇气、要有明确的斗争目的。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这样的同志到最后只能主要是革命的进步工人。（当然，一开始可以由少数其他社会性质的革命分子带领）

## 3. 群众缺乏有力的武器。

县政府的警察已经大量的装备了防爆盾和警棍，在势均力敌或敌情具优的情况下，群众客观是需要有一定威胁武器才能打垮和彻底压倒对付（比如配备和警棍相对应威胁水平的棍棒等等）。因此在今后可能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准备武器，在群众民情激愤和警方持武器的情况下，尽量发放相对应的武器给参与斗争的群众。因此，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可以在平时准备武器，以便带头冲锋、指挥和支援各地群众运动。

## 4. 中了县长的缓兵之计。

县长被逼出面后，因为没有第一时间控制住县长，给了县长等待警力到达的时间。应该像围攻学校方面的群众已有，应该第一时间控制住县长，即使后来警力再多也不敢轻易动武。

但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大部分群众的阶级斗争思想还不够彻底，在许多具体斗争中还不能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因此特别需要人带头）。

### 5. 放走了副校长。

应该有人一直控制住副校长当作人质，这样就可以与警力长期对峙，以便今后长期斗争。并且可以用人质迫使官方达成满足群众利益的诉求为止，这种斗争也有利于进一步的培养群众的阶级斗争精神。

### 6. 缺乏宣传。

群众在游行、对峙的大量过程中，有少数积极群众做了宣传、演讲等等，这些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些宣传不管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都还不够。应该把群众斗争和政治灌输结合起来，并更多、更充分的利用起直播、演讲、发传单等等宣传手段。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这样的宣传同志到最后只能主要是进步工人。

### 7. 没有组织较好的撤退。

当大量警察进来后，群众应该撤退到合适的地点，暂避敌人的优势兵力。如果此时有人质（比如县长、校长），则可以带着人质一同转移到安全、利于防守和交通便利（不宜封锁）的地方，便于大量群众日夜不停的保护家属和控制人质，也利于其他分散的群众提供后勤，以便长期斗争。

### 8. 没有具体斗争速战速决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在具体斗争中，没有下定决心进行最激烈的斗争控制关键敌人、关键设施、关键地区，因此给了敌人准备力量的有利条件和之后掌控运动的主动权；在敌情发展到有利于敌人的时候没有下定决心立即撤退并做好长期斗争的打算。

斗争月刊为发刊于二零二三年九月的数码刊物，  
由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领衔制作。

订阅月刊，联系我们：

[douzhengyuekan@proton.me](mailto:douzhengyuekan@proton.me)

此外也可以通过 telegram（电报）搜索

中国革命交流群：

[https://t.me/China\\_Douzheng](https://t.me/China_Douzheng)

斗争战线：

<https://t.me/douzhengmlm2>

丧钟：

<https://t.me/knellofcapitalism>

以获得更多刊物，学习了解斗争理论、斗争技术、斗争经验，  
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 一篇文章看懂儒法斗争的历史

★ 公社 緬

刚开始左转同志对孔老二（即孔子）没有什么了解，对孔老二的印象停留在特色宣传中的“孔圣人”，是儒家经典的代表，是什么“仁”“义”“礼”“智”“信”传统美德的祖师爷。而有的同志对孔老二有一定基本的了解，知道孔老二是奴隶主阶级的忠实走狗，想要在历史的过渡时期（即春秋时期，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转变）要倒退回奴隶制的儒家复辟路线的头子。但对其仅仅只是有个粗浅的认识，本文会写儒法斗争的历史，能让同志们对儒法斗争的历史有个简单的认识。

为了更方便的使同志们搞懂关于儒法斗争的历史，緬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其中主要为文革时期的关于儒法斗争的资料，緬结合史料，把儒法斗争的历史主要分为四个时期方便进行简述：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二、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演变；三、近代史上的儒法斗争；四、建国后的儒法斗争。

##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这个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春秋末期。这个时期是奴隶制急剧地崩溃，封建制日益兴起这么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就是以少正卯为代表的法家的先驱与孔老二的斗争。少正卯这样一些法家的先驱，积极地宣传变革的思想，来为封建制推翻奴隶制制造革命的舆论。而孔老二是推行一条顽固维护没落奴隶制的路线。

第二个阶段是战国的初期到中期。这个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地在各个诸侯国家建立起来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进一步夺取封建制的胜利积极斗争。这个时期没落的奴隶主想搞复辟，复辟奴隶制。反映在政治思想上，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他们推行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暴力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实行彻底地改革、用革命的暴力彻底推翻奴隶制、建立新兴的封建制这样一条路线。而儒家的代表孟轲，他就是搞复辟、搞倒退、鼓吹一套复古倒退反动的理论。所以思想战线上是商鞅和孟轲这样的斗争。

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个时期封建制基本上在各个诸侯国建立起来了。封建制要进一步发展就要统一。这个时期，在秦朝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这样一个过程里，反对封建割据势力搞分裂搞倒退，反映在思想领域里，以荀子、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他们要促进国家的统一，主张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对孔孟的复古倒退思想进一步进行了批判。同时，对吕不韦这样一些奴隶主的复辟势力搞复辟搞分裂的活动进行了斗争。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造革命舆论，第二阶段进一步进行上层领域的革命，第三阶段建立统一的国家的过程中儒法的斗争。

## 二、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演变

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演变，这个时期比较长。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到鸦片战争1840年，这中间有二千多年。这里面问题也比较多，并不一定完全正确，只是介绍一个概况。从秦始皇统一以后到鸦片战争前，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到西汉的初年，具体来讲到西汉的宣帝。这个时期在政治上的斗争主要是要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来发展封建制度，反对封建的割据势力和奴隶主的残余势力搞分裂复辟活动，防止奴隶制度的复辟。这个斗争反映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就是儒法斗争。主要是围绕坚持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倒退回去搞奴隶制的分封制，这样一个关乎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来展开的。

第二个阶段是从汉元帝以后到隋唐时期。这个时期奴隶制复辟的危险基本上过去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突出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这个时候地主阶级的专政主要是用来对付劳动人民。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就起了变化，开始由进步的阶级转向了保守。反映在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变化，地主阶级最开始从尊法反儒转到了尊儒反法。儒法斗争的情况、性质也起了变化。春秋时期，儒法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到这个时期，就变为地主阶级内部下层的革新派与地主阶级上层的顽固派之间的斗争，两个政治集团、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

第三个阶段是从两宋到鸦片战争前。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开始向后期过渡。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地主阶级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在这样情况下，地主阶级内部对怎样来维护封建制问题上，大地主的顽固派和中小地主阶级革新派之间进行着尖锐的政治斗争。在怎么来维护封建制度这个问题上，地主阶级内部是有斗争的。这个时期儒法斗争的特点是儒家的思想、儒家的地位越来越高，提高到封建统治者不可一天没有的地位。而中小地主

阶级进步的思想家，他们或者是反儒不反孔，或者是托古改制。在这样的名义上来反对官方正统的儒家。这是封建社会大致三个阶段简单的情况。

### 三、近代史上的儒法斗争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又进入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逐步地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近代史上，儒法斗争也是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展开的。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也吸取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思想，同时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发展这样一个进步的传统，反对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和帝国主义，坚持同儒家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斗争。这个时期的儒法斗争，表现形式和封建社会有所不同它主要是以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这样两种思潮的斗争表现出来。因为资产阶级不仅仅是吸取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思想，同时也吸取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思想，这个斗争的阶级内容也有了变化，变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讲到这个时期的儒法斗争，首先应该讲一讲，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是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高潮。同时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运动，充分表现了农民是中国民族革命的主力军。孔老二的幽灵总是跟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反封建就必须反孔。

太平天国在起义一开始，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在他教书那个地方（他是小学教员），就把他私塾里边的孔老二牌位砸碎了，这是第一个行动。他没收孔老二牌位，宣判孔老二是妖人。洪秀全为了动员农民起来造反，他当时编过一个宣传的东西，就是为了反对孔老二，使大家的思想解放出来。当时编了五个故事，因为太平天国他是信奉上帝天主教，他说，有一天，皇上帝把他们找了去，把孔老二给押了出来，把他那些《四书》、《五经》都给摆了出来，当时指给孔丘看，说，你拿这些东西教老百姓，把老百姓都给教坏了，你的罪行非常大。孔丘开始要辩论，说了一通，皇上帝非常生气，就命令天使把他抓起来鞭挞他，孔老二跪在地上，不断的哀求。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在当时来看，是人们思想一大解放。地主阶级的圣人跪在农民阶级的代表面前接受审判，接受鞭挞，而且苦苦哀求。这个事情是了不起的思想上大解放。所以太平天国为了推翻封建主义，在思想上首先要打破孔孟儒家思想的束缚，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斗争，宣布孔孟的那些经书都是妖书，禁止人们读孔孟妖书。太平天国的反孔运动，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民主革命的发展，推动

了资产阶级的反儒斗争。

在近代史上，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还有个重要的特点：在近代史上，凡是搞尊儒反法的反动派，他们总是同崇洋卖国联系在一起。这是由于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要维护他的反动统治，必然投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借帝国主义来保护他。而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也要依靠中国封建主义者做他的走狗。所以这两股反动势力，封建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思想上也要求用孔孟的这套东西来束缚人民。所以封建反动统治者，要尊儒反法，总是跟他崇洋卖国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清朝的反动统治者，一面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义和团农民起义，一面就投靠帝国主义。当时清朝统治者就大叫“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宁愿把这个国家送给帝国主义，也不让劳动人民起来当家。近代史上的尊儒反法斗争总是和崇洋卖国联系起来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这个时期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儒法斗争主要是围绕变革维新，还是顽固守旧这样两条政治思想路线来展开的。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在这个时期，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革命派要革命，反对封建的顽固派和保皇党维护封建制度这样一个斗争。反映在两种思潮斗争上面，主要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要样两条路线、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

第三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这个时期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封建势力再搞复辟帝制的斗争。在思想意识领域里就是复辟帝制和反对复辟帝制这样两条政治思想路线斗争。

#### 四、建国后的儒法斗争

建国后，新中国进入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国外有帝修反猖狂攻击，国内有旧的社会习惯势力不甘于自己的灭亡，拜孔教搞诡辩，这些人混入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领域，混进党内，混进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等上层建筑领域，举个例子，在1962年5月26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名为《孔夫子评议》的文章其中有段话：“礼是孔夫子日常所修习以教人的专业，他将平日对礼的实践合之于原始礼制之所由起；更将所有对礼的认识总结起来升华而得到对‘仁’的重要性的认识，才提出一个‘仁’字作为他思想的核心，再由仁这一核心而有上述‘克己’、‘爱人’、‘推己及人’、‘与人忠’、‘无怨’、‘不悔’、‘人任焉’、‘得众’、‘足使人’等等作用的分析。是孔夫子的思想方法也还可说是由感性认

识而升华为理性认识的；换句话说，也还可说是以客观存在为第一性，而以主观思维为第二性的。我于哲学本无素养，这样的认识方法，就浅学所及，似乎还不失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孔夫子的世界观还不但是唯物主义，似乎还有点辩证唯物的味儿。”文章竟把孔子打扮成“辩证唯物主义者”为当时的“拜孔”大造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同志为旗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积极研究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研究历史周期律，把孔老二批倒批臭，批深批透，留下了许多历史文件和思想基础使得在走资派夺权后，在一段时期也不敢直接举起孔老二的大旗，在那一代革命青年渐渐老去，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后，重提儒家经典，说什么孔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创者，要坚持文化自信，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等反革命言论，开办孔子学院、拍影视片，当孔子遇到马克思这部影片就是十分突出的代表。这是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两个阶级的斗争。絀主要把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由建国刚开始到1965年文革发动前，这一时期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过程，是越来越多的新生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压倒越来越少落后的旧因素的过程，是无产阶级压倒资产阶级及其剥削阶级的过程，但剥削阶级不甘于自己灭亡，他们混入党内变成走资派、党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混入上层建筑变成阳奉阴违、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想复辟，挥舞着尊孔的旗帜，为他们自己复辟的行动做掩护。此时阶级力量对比正处在此消彼长之际。

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时期，是东风压倒了西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全面压制剥削阶级世界观，是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主义下最激烈的时候。毛主席为领袖及其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发动文化大革命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使其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认为运动的重点是一斗、二批、三改革（全文看《关于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运动前期斗垮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文化大革命阶段性的胜利，在运动中期，九一三事件后，江青等同志给出了批林批孔的方案，给文化大革命打补丁，开展研究儒法斗争进一步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运动后期评水浒，研究儒法斗争，运动结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把邓小平、林彪、孔老二结合着批（从当时批邓时期历史文件和江青同志在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时的发言可以考究）但在1976年10月戛然而止。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今天，是春风吹散东风，东风点燃星火，是资产阶级重新夺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假共产党人迫使真共产党人重上井冈山的阶段。修正主义者篡党夺权占领共产党改变其颜色，把无产阶级的党变为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和历代王朝一样为维护统治重新尊孔，毛主席曾在1973年

与毛远新谈话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入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这是主席辩证法的运用，历史是螺旋上升的，暂时的倒退是前进的开端，从《当孔子遇到马克思》被网友批判和调侃中能看出群众是反对套着马克思皮的孔老二的。特色表面上说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实际上实质不过是推行反革命的儒家的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把戏，而孔老二及其儒教的那套反动理论从封建社会就演变了历代国家机器的愚民手段，禁锢人民的思想。到了特色的时候，群众拿起主席的话，文革中批孔的文章去反对他们。这是当代人民群众和特色的矛盾体现，是群众重新拾起理论武器去反对套着共产党外衣的特色的阶级斗争。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左派队伍会越来越强大，总有一天将胜利！



# 反对进厂、恐惧斗争 ——评《新十月》的机会主义路线

★ 统一战线

《新十月》倡导的工人工作路线本质上是一条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集中表现为两个特点：反对进厂融工和恐惧经济斗争。

小资产阶级是一个懦弱、妥协、动摇的阶级，他们充满了两面性。他们自身受到压迫，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希望改变社会，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比无产阶级稍好，他们又舍不得自己那些瓶瓶罐罐。

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新十月》机会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他们想做些工人工作，但是他们又舍不得自己的身段，不愿意隔断自己的退路，因此他们反对进厂融工，因为进厂融工就断绝了他们的后路。他们想做些工人工作，但是又惧怕参与工人为争取自身利益的经济斗争，他们害怕现实的经济斗争引来资方甚至政府的打压。

反对进厂融工、恐惧经济斗争，这本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懦弱性的表现。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懦弱，他们拼命在自己卑怯的躯干上面涂上革命的彩绘。于是，他们就体现出一种极端的矛盾——恐惧经济斗争，但是却高呼政治鼓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嘴里所谓的政治鼓动，无外乎就是给工人讲讲课而已，没有任何现实的风险。就这样，他们用貌似激进的方法，把现实的斗争推到遥远的将来，在逃避斗争带来的风险的同时，又把自己伪装成了敢于鼓动的革命者。

然而这还不够。只有彻底污名化进厂融工的路线，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才会获得短暂的喘息。于是，他们一边伪装成自己仿佛也在融工一般，虚构出所谓的夜校模式招摇撞骗；一边又罔顾事实，用胡说八道的方式攻击进厂融工路线。

这一切就构成了《新十月》的全部实质，用虚构、谎言、卑怯、懦弱堆砌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

## 一、反对进厂融工

### (一) 同志，你想干革命吗？那请逃离工厂吧

在《去进行政治灌输吧！——当下融工策略的不足》一文中，《新十月》明确地将自己的工作思路和进厂融工对立起来。

*“当下，对于渴望实践但是却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做的知识分子们，有这样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进厂扎根成为一个工人，以工人的身份先交朋友，去接触工人，从交朋友和搞经济斗争开始做工人工作。”*

*我想要提出另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知识分子们应该去工厂和工厂附近（如住宿区）接触、教育、组织工人，要利用知识分子本身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相较工人更加充裕的时间，从第一次深入聊天接触和第一次派‘传单’开始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尝试把工人组织起来，同工人一起进行理论学习。”*

这是新十月讨论融工的早期文章。在这里，新十月明确把他们的思路和进厂扎根融工的思路对立起来，称其为“另一条关于工人运动的思路”。结合新十月的其他文章可以看出，这个“另一条思路”本质上就是反对进厂融工的思路。

为什么要反对进厂融工呢？因为工厂生活太苦了，会使得同志们“身体疲惫”，进而“意志丧失”，最终导致这些受不了工厂苦的“优秀的左派同志”流失。在《评东风与统一战线的分歧》一文中，《新十月》说：“12小时的工作会让厂内同志失去做理论以及宣传工作的可能性，身体的疲劳会带来意志的丧失，而长期没有斗争的可能以及没有办法进行政治灌输更是会加剧这一点，让优秀的左派同志流失。”

**《新十月》的这段话在事实层面是错误的，在理论层面是反动的。**

但凡熟悉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有众多优秀的革命者出身工人或者曾经在工厂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和其他工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工人能吃的苦他们能吃，工人能受的罪他们也能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工人形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累不累？当然累！他们像《新十月》口中的“优秀的左派同志”一般，丧失革命意志了吗？丝毫没有！他们非但没有丧失斗志，反倒是在热火朝天的革命工作中，培养出了一大批工人革命家。

**12小时的工厂工作就让“优秀的左派同志”身体疲惫以至于丧失革命的意志，这样的“左派同志”不过是一些没有改造彻底的充满了动摇性的小资产阶级。**

《新十月》罔顾革命实践，散布这种“12小时工厂劳动太苦，导致左派同志丧失革命意志”的谬论，在客观上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迎合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妥协性，在事实上反对进厂融工，以便保留自己的小资退路。

这些动摇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坚定的革命派，而是动摇的机会主义者。他

们不是一切为了革命，而是希望在“保留自己小资退路”的基础上还能“沾点革命工作的光”。

我国有千千万万的产业工人，相当大比例的人从事1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工厂劳动。如果像《新十月》这些懦弱的小资产阶级所述，12小时的工厂劳动就能摧毁一个“优秀的左派同志”的革命意志，那无产阶级凭什么能够成长为革命者？按照《新十月》的逻辑，就算无产阶级成长为了革命者，哪怕成长为了“优秀的左派同志”，12小时的工厂劳动照样会让他们身心俱疲，进而丧失革命意志。

如果是这样，那你们还给那些工人灌输什么革命理论呢？就算工人被你们灌输成和你们一样的人，他们得出的唯一结论也只能是革命的工人必须逃离工厂！“12小时的工作会让我这个优秀的左派革命工人身体疲惫，最终丧失革命意志。我要离开工厂，不然我就无法干革命。”

为了革命，革命者必须从工厂的生产关系里面逃离出来！

为了革命，革命者必须成为懦弱的小资产阶级！

为了革命，革命者不能当工人！

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同志，你想干革命吗？那请逃离工厂吧。12小时的工作太累，会摧毁你的革命意志。”这就是《新十月》的谬论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

## （二）躲躲闪闪，不敢正视主要矛盾

在《评东风与统一战线的分歧》一文中，《新十月》说：

“不论是东风还是统一战线都非常强调进厂，在厂内工作，只不过东风强调在厂内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战线只强调进厂组织工人，而对我们来说，厂内厂外只是不同的工作面，我们不会否定进厂，只是认为在当前的组织程度下，进厂融工有一定的局限性，效果未必有那么好，而只进厂融工，则会限制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的发展。”

在这里，懦弱的小资产阶级遮遮掩掩、躲躲闪闪，既不愿意进厂，又不敢否定进厂，于是就出现了《新十月》这样的论述模式——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抽象层面，《新十月》们“不会否定进厂”，但是一提到要进厂做工作，《新十月》们就找出一堆借口具体地否定融工。

“进厂融工有一定的局限性，效果未必有那么好”。这是一句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空洞的废话。我也可以说“不进厂融工有一定的局限性，效果未必有那么好”。我这样说有益于问题的解决吗？推进了问题的讨论吗？丝毫没有。

问题根本就不在于仅仅进厂融工是否有局限，任何部分的工作单独从整体

中抽出来都有局限性。问题在于当前最主要的矛盾到底是什么？

如果现在融工的人很多，左翼已经在诸多地方和工人建立了联系，但是没有搞政治灌输，我们当然需要把融工的局限性提到首位，大声疾呼，“同志们，我们不能仅仅是进厂融工，我们已经有很多人进厂了，现在制约工作发展的，不是没有人融工了，而是我们搞政治灌输不够！”

**但是，形势并不是这样。**

现阶段，网上指点江山的左翼一大堆，但是真正能够放下小资身段进厂融工的左翼寥寥无几，而这恰恰构成对当前左翼工作最大的制约——整个左翼和无产阶级的接触非常薄弱，甚至都没怎么和工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至于灌输都找不到几个对象。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把融工提到第一位来强调，呼吁所有有志青年以进厂融工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模范带头发挥榜样作用，带动周边的同志，投身到伟大的工人事业之中。

在整个事业极度缺乏融工之人，在整个事业都需要更多人进厂融工，以形成和工人阶级密切联系的时候，《新十月》却绝口不提当前几乎无人融工的现状，夸夸其谈扯些“局限性”之类的废话，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混淆主要矛盾、在革命青年中引发混乱、进而模糊左翼工作的主要方向。

## 二、恐惧经济斗争

《新十月》在抽象层面不反对经济，但在具体层面对经济斗争异常恐惧。为了在事实上反对经济斗争，他们罔顾事实、胡说八道，极尽歪曲之能事。

### （一）《新十月》采取撒谎的方法逃避经济斗争

在《融工故事：合法工作浇灭融工热情，右倾路线劝退青年左翼》一文中，《新十月》说：

*“目前各地的左翼组织一旦开展工人工作，就像《怎么办》里描述的那样，总会在开始发动经济鼓动和斗争阶段就被政治警察打压破获，小组成员加速流失，历史经验不能继承，组织得不到进一步地发展。”*

《新十月》这段话和当前的客观情况完全不符。事实上，在沿海工业城市，多数产业工人都经历过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然而有多少工人遭遇过“政治警察”的打压和逮捕呢？有许多斗争甚至连基层派出所都懒得管——因为这种事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只有在那些规模很大、坚持时间很长的罢工中，资方和政府才会用抓工人代表的方式来镇压斗争。即使如此，也有很多工人能够坚持斗争。第一批代表被抓了，剩下的工人就选出新的代表继续罢工，被抓的工

人代表往往拘留几天也会被释放。

而《新十月》们却被这种“打压”和“逮捕”吓坏了。为了逃避斗争，《新十月》罔顾我国当前的工人斗争形势，罔顾多数经济斗争并不会引来政治警察的事实，说什么“总会在开始发动经济鼓动和斗争阶段就被政治警察打压破获”，还拉上列宁的《怎么办》来给他们这群怯懦的小资投机分子遮羞，真是恬不知耻。

《新十月》们费尽周折，编造谎言，目的何在呢？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用谎言来恐吓左翼青年，“不要进厂搞经济斗争，搞经济斗争就会被抓”。

就算会被抓，真正的革命者也不会因此却步。但是，当进步的青年都冲上战场的时候，落后的投机分子就显露出来了。《新十月》们不希望进步青年大胆往前冲，他要把他们往后拉，以此来掩盖自身的怯弱。

## （二）《新十月》的胡说八道——当前政治鼓动的条件比经济鼓动更有利

为了反对经济斗争，《新十月》一边撒谎，一边胡说。在《融工故事：合法工作浇灭融工热情，右倾路线劝退青年左翼》一文中，《新十月》说：

*“今天的中国，工人自发的罢工会遭到政府和资本的联合绞杀，斗争的规模和成绩都难以达到2010-2015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期的工运高潮……与此同时，在江河日下的今天，除了劳动法律权益，自媒体平台每天层出不穷的自发政治揭露和行动都在进一步戳破这个社会的脓疮，都在不断显示统治阶级与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都在不断启发工人群众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环境下，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左翼同志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理论出发，做广泛的政治揭露，启发工人的政治意识，同时也要开展经济斗争，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才能最广泛地组织起工人的力量。我们要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同时开展起来，通过政治斗争给经济斗争进一步创造条件，组织起工人的阶级斗争。”*

这段话的后半段体现了《新十月》的两面派嘴脸，他既要反对经济斗争，又不敢明说自己反对经济斗争。因此他一边告诉你“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试图引导左翼青年远离经济斗争，一边又告诉你“同时也要开展经济斗争”，试图维护他“也不反对经济斗争”的形象。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全是胡说八道。什么叫做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是经济鼓动容易被破获，政治鼓动不容易被破获？你《新十月》不是编造了一套经济斗争“总会被政治警察”打压破获的谎言吗？那你告诉我，在你这套谎言的背景下，怎么可能做到搞经济鼓动“总会”被抓，而政治鼓动还不被抓的？仅仅因为自媒体平台发过揭露性文章，你以政府为直击进攻对象的政治鼓动，就比以某个资本家为进攻对象的经济鼓动更安全？你要求打倒当局的政治鼓动，就比要求涨薪的经济行动更安全？

在当前的情况下，经济斗争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哪个工业区没有经历过罢工，哪个工人没有听过、见过或者经历过罢工。经济斗争如此之多，如此普遍，对当局来说是如此的见惯不怪，左翼发动的经济斗争完全能够隐藏在众多的自发斗争之中。《新十月》却编造鬼话，谎称左翼一旦搞经济鼓动，总会“被政治警察打压破获”。政治斗争在当前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在工业区更是凤毛麟角，而《新十月》却仅凭自媒体的揭露文章，就认为“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你这里的政治鼓动是什么呢？是关起门来过家家吗？简直是无稽之谈。

《新十月》从右倾到左倾，反复横跳，一方面舍不下自己的身段，不愿进厂融工，一方面怕这怕那，罔顾事实。说什么一搞经济鼓动就会被政治警察破获，以此恐吓左翼青年，另一方面又要在口头上表现得极端革命，说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激进的话。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表现。

### 三、《新十月》们真的在融工吗？不，他们在撒谎！

《新十月》们说他们也在融工，但是他们的文章却表现出对工业区的惊人无知。在《评东风与统一战线的分歧》一文中，《新十月》认为经济危机会导致工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各厂的工作时长有极大概率被缩减到8小时，到时候，这个8小时还是12小时的争论有可能就会平息下去，因此我们还是要点明8小时还是12小时要求的本质是什么。”*

这段话彻底暴露出《新十月》对工业区的无知。首先，在当前条件下，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只能获得底薪，这个底薪在多数厂就是最低工资标准，这根本不够工人生活，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其次，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导致订单下滑，厂方就会裁员，逼走一部分人，让留下的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厂方不可能长时期大规模地让所有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因为这样做会让所有在职工人都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再次，厂方的确有可能短时间采取八小时工作制，其目的在于逼迫工人主动离职。某些电子厂，旺季的时候有上万人，淡季的时候只有五六千人。在淡旺季交替的时候，厂方就会控制加班。此时，基层管理会让自己的亲信加班，而不给其他人加班。于是，没有班加的工人就会自离，剩下的工人多数还是十二小时工作制。而在劳务派遣制度泛滥的地区，资方更常见的方法是直接把一部分工人退回劳务派遣公司，剩下的工人继续保持12小时工作制。

《新十月》居然幻想经济危机来了，厂方就会把工作时间压缩到八小时，

这只能说他们对工业区一无所知。任何一个在工业区的工人，都能一眼看出《新十月》上述说法的可笑之处。

他们不仅不知道经济危机下厂方会如何处理（而这一点凡是打工的人都知道），他们对工人的关注点也知之甚少。在《中国经济形势与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一文中，《新十月》认为：

*“中国工人当前面临的一般意义上的以食品、燃料和房租为主的通货膨胀并不严重，其中房租还有下降的趋势，但工人面临的医保、社保、小孩上学等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却更为严重，所以中国工人阶级面临与其他劳动者一起争取社会民主的任务，比如反对医疗腐败，要求国家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反对学费上涨和预制菜进入校园等。”*

这段话幼稚到让人发笑。当前每一个工人都面临资本的具体压迫。许多工厂通过“自离扣工资”的方式限制工人辞工，逼得工人只能放弃工资“提桶跑路”；某些厂会制定高额的生产任务，完不成就“免费加班”；某些厂随意调休，导致工人拿不到应得的加班费；某些厂和中介勾结，在返费方面设置诸多陷阱；多数厂不按规定缴纳社保和公积金；许多工厂关厂不给经济补偿金；等等。工人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资本的压迫，也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左翼完全可以在工人反抗资本具体压迫的斗争中把工人组织起来。但是，他们根本无视工人的这些切身利益，却要求工人去参加什么反对“预制菜进校园”之类的事情（许多工厂食堂的饭菜质量甚至还不如这些预制菜），简直愚不可及。这根本不是一个熟悉工业区的融工者说出来的话。能说出这样的糊涂话，只能说明一点，他们笔下的工人，不是真实的工人，而是他们脑海中想像出来的工人。

在这里，我们呼吁愿意听信《新十月》鬼话的、会被12小时工厂工作搞得丧失革命意志的“优秀的左派同志”们，尝试去工人群众里面，号召工人去搞反对预制菜进校园的斗争吧！我们想看看，这些12小时工厂工作就能让自己丧失革命意志的“优秀的左派同志”，是如何被工人无情嘲笑的！

《新十月》在《融工分享——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一文中，大肆吹嘘他们的融工经历，把自己装扮成“也在融工”的样子，表现出一副对融工“很有经验”的派头，但是，他们居然连工业区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从中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们根本没有融工，他们虚构了自己融工的经历，他们在撒谎。至于夜校模式，大概率也只是一种他们脑海中的想象。

他们拿着想象的东西，虚构自己融工的经历，跑到外网上来宣传，忽悠左翼青年按他们的套路去干，其目的就是传播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

#### 四、小结：新十月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路线

《新十月》们的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个路线集中体现为两个特点——反对进厂融工，恐惧经济斗争。这是小资产阶级必然提出的工作路线。《新十月》们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阶级。

他们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充满妥协和动摇，12个小时的工作都会让他们身体疲惫到丧失革命的意志。

他们在因为压迫而不得不正视革命现实的同时，却始终不时地回头看看自己来时的后路有没有被切断。

他们一面被革命的形势裹挟着往前走，一面又不断地把先进的革命者往后拉，“慢点！慢点！别把我的后路都堵了！”

他们唯唯诺诺，胆小怕事，以至于在满是工人自发经济斗争的今天，他们还会因为恐惧斗争，而虚构出左翼一旦搞经济斗争就会被政治警察破获的鬼话。

他们怕被别人看穿自己的懦弱，于是一边逃避现实的斗争，一边喊着激进的口号，编造出当前“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的谎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把斗争推向更遥远的未来。

他们还伪装成一副自己也在融工的样子，以一副资深融工人士的派头指指点点，但是他们对工业区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以至于在他们每一次试图对工业区具体讲点什么的时候，都会露出屁股上面那个“我其实不懂工业区”的纹章。

这样的阶级，提出的路线一定是充满了妥协和摇摆的，一切真正的革命同志，都要擦亮眼睛，透过他们的花言巧语，看清他们的本来面貌——哦，不过是一群懦弱摇摆的小资产阶级！



# 用“到工人中去”融工范式分析新十月融工故事

★ 统一战线

本文用“到工人中去”的《我们是怎样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一文总结的科学的融工范式，分析新十月的《融工故事：合法工作浇灭融工热情，右倾路线劝退青年左翼》与《融工故事（二）：少年壮志今何在，星火还需柴助燃》中的融工失败案例，指出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缺乏公开斗争的意志和策略，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新十月原本的分析与革命南辕北辙，若不坚决批判，必然使更多星火灭于小资产阶级的“厂外灌输”和“政治报”！

“到工人中去在”《我们是怎样融工的？—兼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中提出，科学的融工分为四步：进厂调研，发现矛盾 → 广交朋友，形成圈子 → 领导斗争，争取胜利 → 融工深化：社会主义灌输。

而新十月两篇融工故事中，A同志与B同志的融工，“第一步是交朋友”，“第二步是个人灌输”。可以看到，AB同志在交朋友前缺乏对厂内矛盾的科学调研，并且个人灌输并不是基于厂内矛盾、以斗争为目的开展的，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源。

调研厂内矛盾，一是从工人切身感受出发，分析工友普遍关心的最重要的利益是什么，二是分析厂内各阶级，哪些是工人的朋友，哪些是工人的敌人。缺乏调研的A同志，在第一个工厂的文娱组织遇到问题：“很难跟工作对象发生联系。因为参加这些娱乐活动的主要是办公室文员、班组长和年轻工友，普工少、班组长多”。A同志认为其他厂内班组长等，都是普工的敌人，这是没有进行阶级分析的结果！

“到工人中去”在他们厂的分析中就提到“班组长的工资比普工高不了多少，班组长和普工在大多数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班组长在本条产线的普工中威望较高，如果能争取和团结他们，是可能在工人斗争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B在第三个厂的斗争有进展，也是“班组长的反抗意识强，对厂里满腹抱怨，不怕与厂里对抗”。而A同志没有分析班组长是否会在斗争中支持工人，

因为“普工少、班组长多”，就觉得接触不到工作对象了！失去了联系班组长的机会！所以，“到工人中去”指出：“调研分析的结果为下一步交朋友的方向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指导，帮助我们将交朋友的工作进一步深化，更好地进行工友的组织（圈子）建设。”

另外，对于交朋友的目的，AB同志与“到工人中去”也是截然不同的。AB同志都是在筛选其中对政治法律感兴趣的工友，为灌输做准备。而“到工人中去”重视建立在工厂各区域都遍布的、有代表性的朋友圈，从而“掌握工厂的全方面信息”，以及“交流法律知识，分析工厂的动向，为搬迁补偿的斗争做准备”。交朋友已经是在建立服务于斗争的组织！而AB同志的交友仅仅是在挑人组织学习。这种缺陷导致A同志所在的第二个工厂发生自发罢工时，“罢工的核心部门和A所属的不同，A同志接触不到核心人员，认为也不好去罢工现场，只能来了解一些外围的情况。”试想，如果他们在交友时注意的不是工人原本的素养，而是要建立与厂内各区域广泛的联系，那么怎么会接触不到其他部门的人员呢？怎么会“认为也不好去罢工现场，只能来了解一些外围的情况”呢？

交朋友后，AB同志直接开始劳动法学习，并空谈维护权益。这种空谈很快使工人积极性丧失，而工人学习后问“我们该怎么做，能做些什么”，A同志却答不上来。最后A同志吐槽工人中“能够达到认可斗争和工会程度’也就2-3人，而且层次不怎么样”；B吐槽“这个过程没有发现太好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对组织斗争完全无能的，却还吐槽工人不怎么样！真是小资的傲慢！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引述道：“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AB同志不懂工人们需要的是组织，在科学的组织下任何工人都能发光发热，而是从知识分子角度，以为工人自身素质最重要，所以把精力放在挑选人，而非组织上！

A同志在四个工厂中都是没有开展斗争的，一是受到厂外工作的拖累而无力组织厂内斗争，二是缺乏调查研究，发现不了矛盾。无论多“良心”的工厂，工人和资本家都是尖锐对立的，怎么可能没有斗争？新十月的《融工分享——

我们是如何进行融工的？》也说他们扎根厂内“三个月、半年、一年多或者三年”，还搞不起来经济斗争，他们是先在厂外做调研，进厂就只埋头交朋友。这些只能说明新十月和其融工故事中的组织，不太会在工厂现实中应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与利用厂内的主要矛盾。

**B 同志在其第二个工厂调研则是自大的脱离工人的，也必然导致了小资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他主观地“确定投诉公积金的诉求后，号召工人签联名信，工人没有响应。自己就带头投诉公积金”，最终只是导致自己处罚。工人“认为是送死”，他是小资，有退路，就真的自己去送死。与 AB 同志、新十月相反，“到工人中去”的同志，则是在第一步调研中，就“从工友的切身利益和切身感受出发”，“找到了工友普遍关心的两个重要问题”，判断该厂“会围绕着补缴社保 / 公积金以及搬迁的经济补偿问题发生重大矛盾和冲突。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着手开展交朋友和筹备斗争的工作”。与他们的预测相符，4 个月后工厂果然因为搬迁问题向工人发动进攻！这充分体现了使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分析厂内主要矛盾的科学性与巨大力量！这与纸上谈兵的小资空耗 4 年的无能斗争，真是天壤之别。**

第二个工厂的斗争失败后，B 同志在第三个工厂转向了厂外，厂外组织联系到了其他厂的斗争，进行尾巴主义的法律支持（在完全不了解厂内情况时，怎么可能领导组织厂内斗争）。然后 B 同志又跑回自己工厂，去“通过写联名信等方式鼓动工人争取公积金的斗争”。B 同志被厂外灌输路线拖累了！导致他没有进行本厂的调查研究与斗争组织！虽然恰巧得到班组长支持，但他本来也已经打算离开工厂，就只是在厂内会议演讲鼓舞大家团结，最终被开除。这种小资的鼓动表演，竟被新十月说成“经济斗争取得了成绩”！

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成绩：“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调研，以及四个月的以斗争为目的的交友、组织、法律学习，用怠工击退资方初步试探、然后反复拉锯斗争与警察劳动局资方斗智斗勇、最终通过五天的集会斗争为 60 多名工友争得共 100 多万元的补偿！这是科学的公开的非秘密的斗争！而新十月从 AB 同志无能的斗争中学到的却是工人的维权只能是“非法的、不公开的”！新十月说 AB 同志所在组织“着手鼓动经济斗争之后就迅速被政治警察破获和打压”，但举出的故事中，他们甚至连警察的面都没见到！**提出政治报”秘密“斗争路线，只是说明他们和 AB 同志一样，是对斗争无能或完全恐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

最后“到工人中去”“将沉淀下来的五六个核心工友继续组织起来”，进行政治灌输，告诉他们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事业，最终“几名核心工友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愿意与我们一道前往下一个工厂继续开展工作”。在准备斗争的过程，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对工人作经济斗争的教育。经过斗争的实践，再水到渠成地灌输给他们长期的政治事业。知识分子和工人共同习得了与资本家斗争的组织方式，共同成为了更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难道不比 AB 同志空洞的政治灌输强百倍吗？新十月将“到工人中去”批判为经济主义，只能说明他们不但不理解经济斗争，更不理解政治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说，政治斗争是要“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在我国，如对劳动法的真正执行）。为此，要使得“联合起来的工人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用公开斗争的实力逼迫政府“讨论缩短工作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向工人让步的问题”。要使工人获得这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只能像“到工人中去”和俄国革命先驱一样，一开始先锻炼小范围的和资本家与警察的斗争，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对抗统治阶级的工厂组织。只有当组织壮大到不惧特色政府的军队时，工人才能逼迫政府真正执行劳动法，这将是我国政治斗争的里程碑！

而想着靠厂外和政治报作政治灌输的新十月、前进报、东风的知识分子们，完全无力帮助工人建立有斗争力量的组织，却鼓动工人去造反，这是完全唯心主义的。难道工人只要有了政治意识，不需久经考验善于斗争的组织，就能对统治者发动进攻？往轻的说，这正是屈从于工人的自发组织；往重的说，这是为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利益，让工人去做炮灰！我们已经在《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指出了他们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实质。正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利益蒙住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对“到工人中去”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以及已经总结出来的科学的融工范式视而不见！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害怕厂内斗争的后果的——如故事中 B 同志所说“担心自己以后的生存和工资收入问题”。

### 拓展与总结：

“到工人中去”的融工，已经能开枝散叶了。例如上述 3 名同志，花五个月时间，培养出五六名有斗争经验的工人骨干，跟他们去下一个厂。如果他们下次融工又把人数扩大一两倍，组织就越滚越大。他们把唯物辩证法与工厂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灵活运用，他们已经总结出了在单个工厂内融工的科学的

范式：进厂调研，发现矛盾 → 广交朋友，形成圈子 → 领导斗争，争取胜利 → 融工深化：社会主义灌输。当他们发展出多个工厂的工人组织时，自然就会产生更高级的组织架构。自然也能通过调研发现多个工厂共同存在的与资方的矛盾，以此预测未来多个工厂矛盾共同爆发的节点 → 提前为此建立跨工厂的圈子 → 筹备跨工厂的斗争 → 在斗争后继续深化革命政治鼓动，这就自然把融工范式扩展到更高级的组织。东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如何从小组阶段逐渐走向先锋队》中总结道：列宁 1895 年的彼得堡组织有 20-30 个工人小组。我们相信“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靠他们的科学融工范式，可以建立起和彼得堡组织一样的、**统合 20-30 个工人小组的组织。**

可能东风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让他们连自己的文章都忘了。因为自己斗争的无能就害怕公开斗争了，就要去搞秘密的政治报了，好像可以不用直面警察就能“秘密地”和他们斗争。东风在自己的上述文章中对列宁基于彼得堡组织成立的“斗争协会”总结道：“由于群众性的鼓动开展地广泛，在工人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传单的出现甚至被工人看作是罢工的信号，以至于只要发出一份传单，吓得惊慌失措的企业主还不等工人宣布罢工就连忙满足工人要求。甚至沙皇的大臣们都被传单弄的惊慌失措”。当工人真正组织起来，就自然有对抗国家暴力机器的力量。正如 22 年富士康工人击退军警一样。富士康工人因为没有先锋队领导而在斗争后解散了，“到工人中去”的组织发展到能够领导富士康那样规模的斗争时，他们的组织也就开始成为先锋队的雏形。正如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所说：“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决不搞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统一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源泉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吗？”

要实现这个愿景，靠什么？靠培养能够和统治阶级面对面斗争的工人革命家，靠建立能够和统治阶级面对面斗争的革命组织，这正是在“到工人中去”正在做、且已经开始学会做的。他们做到这些，靠什么？靠的是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工厂斗争的具体情境中去！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脱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他们的世界观中充斥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对人类社会、对世界正确的认识，才能以此进行最为科学的群众组织，靠无产阶级的科学的组织，打败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的靠蛮力的组织！而 AB 同志的小资产阶级组织路线、以及

前进报新十月东风的同志鼓吹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报，只能是和资产阶级的组织一样不科学、脱离实际、斗争无能的组织，即使做得再大、纪律再严密，也是毫无用处的。

我们号召前进报新十月东风的同志放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加入我们。如果越来越多革命者像“到工人中去”一样，去研究、去组织工人，去实地应用唯物辩证法，抛弃小资产阶级利益去和工人融为一体，那我们一定能产生任何资产阶级都无法抗衡的强大组织，我们在战略上是可以藐视敌人的！

让笔者用列宁的话结尾：“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还是腐朽的我国官僚资产阶级），都是支持不住的！”



# 民主皇帝（小说）——读者投稿

★ 邱子易

2182年5月25日，塔里夫郡。

我斩下最后一台“皇帝近卫”号机动战士，在我的驾驶舱内，我看着它的头重重地砸在地上，滋滋闪着电弧，旋即爆炸。柯西张开的护盾，挡下了剧烈的能量，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清除任务完成，塔里夫皇帝已经没有任何机动战士了，完毕”。

“收到，柯西。带着你的小队与我们汇合，在胜利之塔，位置正在发送”。

“收到，正在前往，完毕”。

我指示着我的小队，机动战士们呈列队滑行在火星的大地上。驾驶舱内的大屏上，呈现着街景，我看到扬起的硝烟被晨光穿透。



## 二

从很远处就能看到胜利之塔，它高耸地直通云霄，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待走到其底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无数个历史的足迹。战火的侵蚀使它伤痕遍身新的、旧的，可它依旧屹立在这里，绽放着不朽的光芒。

其他机动小队皆已抵达，不少驾驶员坐在打开的舱门上，仰头欣赏这座于火星独立日兴修的建筑。跟随他们的目光，我看到许多黄夹克维修工攀附在塔上，他们在修补塔的伤痕。这也难怪，毕竟，看到塔顶喷射的巨大的通天能量柱，就该想起隐藏在云中的整个塔里夫郡的能量屏障。“要是塔坏了，这里的所有人都会瞬间灰飞烟灭。”我想象那副场景，不禁起了全身的鸡皮疙瘩。

我报告了归队，被告知皇帝正躲在塔里，爆破人员正在进行作业，因此部队可以暂时自由活动。虽说这片区域已被素清，但到底是交战区，还是皇帝的首都，我可不敢四处溜达。我操纵柯西，让它单膝跪地，手臂伸直到地面以作我下地的桥梁。这是一个很便捷的方式，上下都是，而且很帅，不少年轻驾驶员都是这么干，只有那些老古董们还在死守令人费解的方式。我看着我的机动战士，心头一动，拿出相机拍照。

“虽然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我还是惊讶于你如此钟爱那个古董。”一个声音传来，我并未回头，而是迅速下蹲，双手后抱，再猛地往前一摔。灰尘散去，露出了那张熟悉的脸——耐德。

“不错嘛，身手越来越敏捷了。”他夸赞道，一只手被我紧紧摁住。

“你也宝刀未老。”我回敬，他的另一只手架在我的咽喉处。

## 三

耐德·琼斯，维尔郡人，今年已经51岁了，身子骨依旧劲朗。三年前到塔里夫郡作间谍，最近和我们配合攻城。他在战场上救了我一命，无家可归的我于是入了伍，被安排在他的小队里当斥候。他是个狡猾、爱财又幽默、博闻的老头，有时候又会慷慨解囊，总得来说算个好人。但是我一直没搞懂为什么他要兵团会议上力推我当机动队长，那是连我都觉得有些不妥的事情，更别说那些纷纷反对的队长们了。我还记得他是这么劝我的：“这是一个好机会，仅仅是对你，而且是对很多人。机动队的选拔体制已经十分僵化了，高层里全是老骨头，这样是打不赢仗的。你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开‘先例’，你必须坐那位置上。”我被说服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就这样，他原本是机动兵团里最年轻的队长，后来成了我，再后来又成了其他人。我由此对他产生了一股敬佩之心——直到后来我得知他领了一笔我一分都没见着的不菲巨额奖金，于

是乎，他的睿智形象多了几分灰暗色彩。

我和耐德坐在柯西的掌中，我让柯西将手臂抬高，因此我们能更全面地一窥胜利之塔的底部。他掏出从地球走私来的烟，递给我一根，只一口我便吐了。我威胁他说把好货拿出来，不然我告纪委去。他才讪讪地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盒子，刚一打开我就迅速抽了一把。

耐德咒骂一句，说我真是长大了嘴都挑了。

我笑道：“也不看看我是被哪个好师傅带着的。”我躺下，看着天上的云，回忆道：“16岁那年，忘了么？我们要去打莱克郡，我负责破开通道，门后边藏了个‘杀手型’，架着炮等我呢。老李把我推开，自己连人带机地被轰了个三连高爆，驾驶舱当场蒸发，尸体都没留下……不会吧，这能忘？当间谍当得脑子清空了？我们没给他办葬礼，只是凑钱把他的遗物烧了撒在火星外边的，完了我就找你要了根烟，一辈子记得那呛味。”

他没回话，只是摇了摇头。我知道他不会忘掉老李的，他们俩一起出生入死无数次，早就把命托给对方了。只是，他在刀尖上舔血了一辈子，要干的事太多，周围的人死地更多，以至于老旧的记忆淡化了。我有时候也会在想：“我是否有一天也会忽然忘记一切呢？没有意义的一生、杀人和被杀的一生。”后来无数次从地狱边缘爬回来，使我不再去想了——我随时可能会没有意义地死去，所以，在还活着的日子里，用力去记住，便足够了。

我帮耐德回忆道：“老李和你都是火星‘独立战争’时期入的伍，你和他都是天赋异禀的驾驶员。只是迫于体制的无奈才一直是机动战士而非队长的。你天天和我吹嘘的。”我想起和老李的较量，“用换弹夹的假动作趁机掏出高爆手枪使我破防，这招我一直记忆犹新。”

耐德终于有了反应：“更厉害的你还没见过呢。”他轻叹一口气，“可惜……”他对老李到死都没有评上队长一直耿耿于怀，也很气愤那个肚皮很大的机动兵团长。

“别叫我哈，又不是我定的体制。”我试图用玩笑话驱赶这沉重的氛围，“都那么久了，老李肯定不希望我们还伤心他的死。想点别的吧，战争结束了，马上皇帝的头就要被砍了。终于。你不是说要去地球上看太平洋么？钱肯定攒够了吧。”

他顿了一下，呼出一口长烟，袅袅烟雾中，大地的尽头上红色的地平线在跳动。他的思绪不知飘到了哪里，半晌才开口道：“早就够了，机动队长的收入很高的。”他用夹烟的手的小拇指挠了一下太阳穴，接着点了一下耳机，关闭了通讯频道，用严肃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说，我是个财鬼么？”

令人忍俊不禁，“你这不废话……”

“那么，如果我说，早在五年前，也就是‘民主战争’刚开始前不久，我的钱——通过各种各样手段赚来的钱——就已经足够让我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到死，你会怎么想？”

“真是那样？呵，那我只会觉得你脑子简直秀逗了。”讲真，我很生气。

我们和蓝色的能量柱一同静默着，只看到有间或一轮的能量波动。

忽然，耐德率先打破沉默，却是不同寻常地像个真老头一样讲起了他的往事。

#### 四

火星刚开始闹独立的时候，耐德还在上高中，他的父亲在维尔郡的西边能量塔当工人，他们家庭不富有，但也不贫困，耐德很珍惜这个幸福的家。只是越来越重的税收让家里的矛盾明显增多了。

后来，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大，还有过好几场大型的群众游行，维尔郡也有过不少。但每次耐德一家都对这些活动敬而远之。地球用尖锐的手段回应，于是，维尔郡只剩下中心能量塔了，于是，耐德一家陷入了贫寒之中。

耐德20岁的时候，火星鸟在维尔发动起义，第四大道上爆发了激烈的枪战。起义军用街上的车子作掩体，其中一台里载着他们一家。父亲和母亲紧紧护着他，吃下了所有击穿车体的流弹。火星鸟最后攻入了郡政厅，他们成功地占领了维尔，人们都在欢呼，而耐德脸上蒙着血，在人群中盯着正在演讲的起义军领袖，也就是现在的机动兵团长。耐德恨他，他恨火星鸟，他恨“火星独立”。

但是他无处可去，因此他加入了火星鸟的队伍。他从不介意用各种肮脏的手段搞钱，为此他直接或间接地杀了不少人。他的最大愿望是投诚地球，用他的一身情报当投名状。但他最后还是留在了火星，一是他竟然成了机动战士驾驶员，二是火星竟然真的独立了！？他从未想过火星最后真的会独立。“独立了又如何呢？桃子还是一样的烂，反正。”他恶毒地想着，可笑的是，应验了，真是一语成谶。下城区、赌博、毒品贩卖、卖淫、过劳死、极度贫困……这些都还在呢，没有跟着地球军一并被赶出火星。

有一次他回到家乡，想回家看看，发现他的家已经没了，楼房都拆除新建了。在金碧辉煌的大楼地下，几十个衣不蔽体的人围着排风机睡觉。这画面刻在了耐德的脑子里。他当时只觉得幸运：他有机会，他抓到了机会，他站在了胜利的一边——他成功了。

唯一让耐德觉得独立有那么点好处的，就是它催生了老李这样的人。永远

像个傻子一样，那么热情，那么理想，也那么可悲。老李一直都想成为机动队长，但是，评选的年龄要求很高，50岁起步，还只是理论上的最低线，实际上可能要55岁以上才行。老李从30岁开始熬，一直按着评选条例攒军功，如此20多年。等他终于够格的时候，独立了。战争胜利了。一大堆跟猪一样的权贵扭着一层一层的肥肉挤满了机动队的领导位置。甚至耐德有时候都在认真思考：子弹打在这些人身上，是会先喷血还是先冒油？军队在这些人看来是很好的镀金池，因为和平了，不用打仗了！后来“民主战争”爆发，虽然很意外真的会有人为了“自由平等博爱”而去反抗皇帝，但是耐德并不关心。他在意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给那些军队里的新高层来了个当头一棒，他们很多人都云里雾里地在战场上死掉了，还有一些投诚地球了。拖他们的福，军队高层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和严重的断层，需要紧急提拔人才。于是乎，老李终于能评选了，虽然有一年“观察期”，但总归看得到头了不是么？耐德从没见过老李如此开心，他们当晚用一瓶又一瓶、一箱又一箱的酒来庆祝，以及祭奠那些可爱的已死的肥猪们。再后来，老李评了优，成了副队长。再后来，他就死了。

耐德捧着装着老李遗物的灰的盒子，他很生气，他对老李很生气。他怎么老是在关键时刻脑子犯轴呢？但他不恨老李用生命救下的孩子，他们救了无数次的、一直跟着他们的孩子。当装着灰的盒子被飞行器带上天空，耐德计算着时间，想象灰爆开撒在红色火星之外的宇宙之中的样子，他忽然又释然了。“他不一直都那样么？救我也是，救那孩子也是。”耐德无奈地苦涩地笑了，“我早该知道的，他总有一天要死在他自己手里。”他忽然有个强烈的愿望：老李是不差钱的，他甚至连消费需求都没有太高，他想知道老李的夙愿。他找啊找啊，搜寻啊搜寻，终于，他找到了：老李想成为机动队长，然后成为机动兵团长，这样就能在火星公民大会上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改革这所有的不合理的体制，改变那沿袭上千年之久的、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公！

“只要仍有不公存在，只要仍有特权存在——一切的不幸都将永远存在。”耐德想起这句话，这明明是老李只提过一次的被耐德笑称为天真的话，为什么此刻却连着那双坚定的眼睛一起浮现在了他的眼前呢？耐德突然感到了迷茫，他以为这辈子都不曾体会的奇妙的感觉。但他强烈地意识到，无来由地意识到：他必须做点什么。比如自己要先成为机动队长，比如……耐德看向了那个第一次抽烟的孩子。

## 五

“后来，我在一次偶然中听到了一声对皇帝的称赞——那绝不是幻听。我想找到那个人，那个源头，但我找不到。就像水一样，你能找到水浪的根吗？”

从那天开始，我愈发对那个自诩‘民主皇帝’的人感到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去申请当了间谍，进了皇占区。我见到了一幅幅不可思议的画面：到处都是皇帝的语录、肖像，它们被贴在墙上、栅栏上、甚至涂鸦在机动战士身上；无人富有，但也无人贫穷；没有人有民主和自由，因为人们的心中只有神一般的皇帝；也没有人被奴役统治，因为是人们自愿崇敬皇帝，‘民主皇帝’！我的财产在此一无是处，因为人们不习惯于用钱！但我也没被冻死饿死，因为人们给了我免费的生活保障。我想留下，我决定留下，直到总攻了我才以间谍的身份归队。”

“说老实话，叫我在战场上拼杀还成，我是真不适合当间谍。我从一开始进区就被重点关照了。我一点意识都没有，还在大张旗鼓地问：‘皇帝住哪呢？’有一次皇帝去安全部视察，正好看到我了，很疑惑我的行为：我当时正在做必要的间谍工作，发了片荒无人烟的郊区坐标说这儿有重要工业区，这种事我当时一直在干。皇帝对我起了兴趣，他找我私密谈话。我知道我肯定暴露了，索性也就出口随意了，我说：‘你真是外面画像上那人么？’皇帝疑惑地说是，货真价实的本人，怎么了。我说他头发又白又稀，面容杂乱，穿衣邋遢，我现在都能想起那警卫员的紧张的紫脸。我接着又说：‘想必你是一个好皇帝。’他问为什么，我说：‘一是，我没见过不整理皮囊的烂人。二是因为，外面的人都称赞你，吃不饱的人是不会有气力夸赞别人的。’皇帝笑了，笑得很爽朗。”

## 六

耐德看着白炽灯，屋内的沉默让他始终感觉有些闷气。他决定再多说些话，他问皇帝要怎么处理他。皇帝说看他的心情。耐德于是说道：“那看来我是一定活不成了。你现在的心情好不了。”

皇帝深呼吸一口气，说道：“是的，我的心情很不好，也好不了。”他也看相白炽灯，随后闭上眼睛。“但你不会死，我保证。”

耐德撑桌，盯着皇帝，说：“独立领袖，火星鸟的第一叛徒，‘民主皇帝’——请你告诉我，你‘叛变’了一辈子，到最后竟然真的要背叛么？——背叛你自己！？你居然想放任在你手上的敌人！”

“我背叛了所有人，但没有背叛我的理想。”

“那么——请杀死你眼前的这个敌人。”

皇帝笑了，他用蓝色的眼睛盯着耐德，铿锵有力地说：“耐德·琼斯，你是我的敌人么？”

## 七

最后一根烟也抽完了，耐德长呼一口气，站起身来伸了伸身子。我不知沉

思着什么，扔掉了烟头。举目四顾，只有破败的大地与荒芜的胜利，以及像山一样沉默的胜利之塔。



忽然，我们瞧见柯西脚下，一个士兵正在手舞足蹈。我和耐德赶忙打开了通讯器。

“你不会怪我吧？”耐德问。在我们面前，是由技术工人们努力维持形态的洞口，还有一些士兵在警戒着。

“不会，只是感觉……太快了。”

由于基底入口被附加了限制，因此暂时只可供一人进入。也就是说，要一个人单独面对不为人知的皇帝。机动兵团长本想让耐德进去，但耐德力推了我。

“我其实以为你会想见见那个老朋友最后一面的”。

“见啥嘛，该说的不该说的，早就说完了。而且，他也想见你”。

“嗯？为什么？”我很意外。

耐德笑了一下，说：“因为你年轻啊，而且……”他停住了。

“没头没脑的，我进去了。”我摇了摇头，打着手电进入漆黑的洞口，寻找皇帝。

## 八

耐德·琼斯看着小鬼渐渐消失的身影，不由得感慨：像啊，太像了，而且不仅仅只是像。

耐德掏出最后一根烟，娴熟地点火，含糊不清地喃着什么。看着四周的年轻人，又看看年老的自己，朝着那个行将就木的机动兵团长走去。

“是个忠诚的叛徒，是个是个慈悲的屠夫；被所有人讨伐，被所有人爱戴；将死得惨烈，将活得光荣；背上百年的污名，沐浴千年的公道；你的军队节节败退，你的人民不断前进；你的眼中迷茫，你的脚步坚定；你会失败，你将胜利。朋友啊，让我们的热血泼撒在大地上，让我们的灵魂高歌于天堂中”。

烟火烧到了末梢，耐德偏口一吐，右手垂下，随后迅速拔枪指向团长——  
砰！！

### 编者按：

1、这篇易子同志向我们投稿的科幻小说，相当优秀，除了末尾的“民主皇帝”有点令人忍俊不禁外，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剧情情节的叙述等处都相当好，值得一阅。这应该算是软科幻小说，只借助了科幻的背景，没有硬的科技来写社科的东西。与那些软科幻不同的是，这篇小说写的是“反动题材”罢了。

2、该作品是一篇含有政治隐喻的软科幻短篇小说，情节较为连贯，语言很生动，人物形象的设计也很有趣，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很多原型。称呼老者为皇帝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在他的引领下国家缺少民主自由，这样的想法以反动派居多，他们疯狂诋毁，将他塑造成一个暴君的形象。另一种是将他作为救世主抑或是传统的帝王形象，这些人是拥有民主权利却运用不好，并且对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并没有掌握好，没有从根本上认知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只将那老者当作神像，这些从一个皇帝的称呼中便能看出。“民主自由”的叛军所到

之处一片废墟，贫富分化严重，被蒙蔽的人民加入他们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而老者的区域人民生活充满希望，分配公正平等，这些也令进入该区域的”耐德“明白了到底哪里才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哪里才是真的在为人民做事，于是也就有了结尾杀死团长的剧情，而”我“这个角色则从最开始的故事叙述者转变为入局者和后继者也是十分巧妙的设定。

3、这是一篇读者投稿的科幻文学类作品，通过对“我”所经历的战争故事，表达了作者对民主、皇帝、战争、阶级社会等概念的思考。小说中人物刻画、背景讲述、情节叙述等方面较为优秀，值得一看。

无产阶级在斗争实践中终将会构建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学大厦，虽然这并非是当前主要任务，不过我们也不排斥闲暇之余这一方面的尝试。

斗争月刊为发刊于二零二三年九月的数码刊物，  
由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领衔制作。

订阅月刊，联系我们：

[douzhengyuekan@proton.me](mailto:douzhengyuekan@proton.me)

此外也可以通过 telegram（电报）搜索

中国革命交流群：

[https://t.me/China\\_Douzheng](https://t.me/China_Douzheng)

斗争战线：

<https://t.me/douzhengmlm2>

丧钟：

<https://t.me/knellofcapitalism>

以获得更多刊物，学习了解斗争理论、斗争技术、斗争经验，  
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斗争公社月刊编委会



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五刊

二零二四年 二月